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15.1

一年出版三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 Joan Martínez-Alier
谈社会学

Volodymyr Shelukhin

摩洛哥社会学与2025年
ISA 论坛

Adbelfattah Ezzine
Abdellatif Kidai
Driss El Ghazouani
Kawtar Lebdaoui

开放科学

Fernanda Beigel
Eunjung Shin
Jae-Mahn Shim
Ana María Cetto
Sarita Albagli
Ismael Ràfols

理论观点

Gabriel Kessler
Gabriel Vommaro

议题开讲

- > 海地：国家的暮色
- > 绘制冲突：形构美洲「绿色」开采的相关争议
- >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简要图解
- > 在危机和不确定时代中的拉丁美洲与哥伦比亚社会学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5卷 / 第1期 / 2025.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编辑的话

今

年《全球对话》今年已经十五岁了。我们能走到今天，得要感谢 Michael Burawoy 的引领，最一开始的刊物，甚至是以手工的方式制作的。2010年9月，他在第一篇编辑的话里面这样说：「我们期望这份电子报，能够成为全球社会学社群的思想交流中心」。经过2014年末于日本举办的第十八届 ISA 世界大会，《全球对话》不再只是电子报，而成为了一份期刊。慢慢地，《全球对话》从最初仅以四种语言发行，变成了涵盖十七种语言、结合线上文章和每年四期（后来是三期）的一份刊物。在这个过程中，刊物的设计也越来越专业，一直参与《全球对话》制作的 Lola Busuttil 和 August Bagà 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2017年底，Michael Burawoy 于於《全球对话》第7.4期编辑的话当中，撰写了《全球对话》的简史，我非常推荐大家阅读。在那之后，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接下了这份任务将《全球对话》以现今的运作模式整合。于他们为《全球对话》掌舵的五年之间，文章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刊物易于阅读、深具批判性且观点多元的风格也保留了下来。2023年，在 Carolina Vestena 与 Vitória Gonzalez 的协助下，轮到我站上了主编的位置。我指出了三项挑战：以 ISA 为核心，同时不仅止于 ISA，来建构公共与全球社会学；重组《全球对话》、增强稳定性；重新定义刊物的沟通与传播策略。

我们在许多面向上有了进展，也还有很多尚待进行的地方。趁着《全球对话》十五周年，以及即将于拉巴特举行的第五届 ISA 社会学论坛等机会，我们将能进一步面对这些尚待处理的任务。在今年的刊物里，我们会讨论公共与全球社会学的一些主要挑战，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和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展开各种对话。《全球对话》必须能够于全球动盪中，针对时代危机给出全球性的回应，并且要在不同的现实与学术文化间架起桥梁、提出知识与政治的替代方案。

本期打头阵的是由乌克兰社会学家 Volodymyr Shelukhin 担任主访人、访谈加泰隆尼亚学者 Joan Martínez-Alier 的文章。Joan Martínez-Alier 是政治经济生态学领域的关键人物之一，在这次的访谈中，两人将会检视乌克兰十九世纪最为著名的学者——Serhii

Podolynsky 的遗绪，并讨论社会理论的环境转向。

第一个专题，概略地介绍了摩洛哥的社会学，文章主题涵盖摩洛哥社会学的制度化、殖民地与外来社会学学派的之间的紧张关系、摩洛哥社会学学派的出现，以及现今较常被讨论的学者、议题与社会学实践的趋势。ISA 学会论坛将于明年7月6日至11日在拉巴特举行，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2021年第11.3期《全球对话》中，由 Adbelfattah Ezzine、Abdellatif Kidai、Driss El Ghazouani 和 Kawtar Lebdaoui 等人组织的马格里布社会学专题。

第二个专题，将带领我们由开放科学的角度思考公共与全球社会学。本专题由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咨询委员会会长的 Fernanda Beigel 编辑，主题涉及：开放科学与包容、跨文化之间的关系（F. Beigel）；开放科学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特殊性（Eujing Shin 和 Jae-Mahn Shim）；科学去商业化的可能性（Ana María Cetto）；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对话、参与式科学、公众参与科学等趋势（Sarita Albagli）；以及开放科学、关怀和知识正义的关系（Ismael Ràfols）。

在理论观点中，两位阿根廷的顶尖社会学家 Gabriel Kessler 与 Gabriel Vommaro，尝试以拉丁美洲现实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框架，来回应「如何研究政治极端化？」这个问题。

最后，是本期的议题开讲。第一篇文章，是由海地学者 Jean-Marie Théodat 撰写，他清晰地分析了加勒比海国家的灾难背后，呈现出怎样的逻辑。此外，Mariana Walter、Yannick Deniau 和 Viviana Herrera Vargas 则调查了美洲的25个涉及绿色剥削主义的冲突案例。最后两篇文章，则是关于拉丁美洲社会学，包含 Miguel Serna 对拉丁美洲社会学学会现况的描述，以及拉丁美洲社会学学会大会，于2024年11月在多米尼加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中发表的宣言。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下一期刊物。《全球对话》万岁！感谢您！■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编辑

PS：当本期已经完成时，我们收到了 Michael Burawoy 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一位公共社会学的全球推动者、伟大热心的全球对话创始人、一位了不起又慷慨的人。为了向他所代表的一切致敬，我们将在下一期杂志中献上对他的纪念。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发布于 [官方网站](#)。

> 投稿请寄信至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编辑团队

主编：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编辑：Christopher Evans.

执行编辑：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区域编辑团队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亚)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sio.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Shaikh Mohammad Kais,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Touhid Kha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l Hussain, Ruma Parvin, Yasmin Sultana, Md. Shahidul Islam, Sadia Binta Zaman, Farheen Akter Bhuiyan, Arifur Rahaman, Ekramul Kabir Rana, Saleh Al Mamun, Alamgir Kabir, Suraiya Akter, Taslima Nasrin, Mohammad Nasim, S. Md. Shahin.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兰：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罗马尼亚：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Elena Mihăilă.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湾：李宛儒, 周芸瑄, 郭智豪, 简芊楹, 黄翊硕, 赖奕玮, 林韵柔, 吕道咏, 李妮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社会学对话」的部分，Volodymyr Shelukhin 与 Joan Martínez-Alier 谈论了 Serhii Podolynsky 以及社会理论中的生态转向。



在主题专栏「摩洛哥社会学和 ISA 论坛」中，涵盖了殖民地和外国社会学流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摩洛哥社会学流派」的出现等主题。



在「理论观点」部分，文本中试图回答如何研究政治两极分化的问题，并以拉丁美洲现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封面来源：Martin Vorel，维基百科



Global Dialogue 由SAGE赞助

> 目录

编辑的话	2	公民科学与新型的权利议程	26
		Sarita Albagli，巴西	
> 社会学对话		重新思考开放科学：迈向公平与包容的关怀	29
Podolynsky 与社会理论的生态转向：		Ismael Ràfols，荷兰／西班牙	
专访 Joan Martínez-Alier	5		
Volodymyr Shelukhin，乌克兰		> 理论观点	
		极化与政治的冲突：来自拉丁美洲的洞察	32
> 摩洛哥社会学与2025年 ISA 论坛		Gabriel Kessler 與 Gabriel Vommaro，阿根廷	
摩洛哥的社会学制度化			
Adbelfattah Ezzine，摩洛哥	8	> 议题开讲	
重新审视摩洛哥的当代社会学		海地：国家的暮色	35
Abdellatif Kidai 與 Driss El Ghazouani，摩洛哥	12	Jean-Marie Théodat，海地／法国	
摩洛哥社会学以及一般社会学		绘制冲突：形构美洲「绿色」开采的相关争议	38
Kawtar Lebdaoui，摩洛哥	16	Mariana Walter，西班牙、Yannick Deniau，墨西哥	
		與 Viviana Herrera Vargas，加拿大	
> 开放科学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简要图解	42
开放与包容的争议领域		Miguel Serna，烏拉圭	
Fernanda Beigel，阿根廷	18	在危机和不确定时代中的拉丁美洲与哥伦比亚社会学	45
开放科学的辩证：		ALAS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	
在 UNESCO 针对开放科学提出建议的三年后			
Eunjung Shin 与 Jae-Mahn Shim，南韩	21		
非商业化的科学：是否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想像？			
Ana María Cetto，墨西哥	23		

「需要重新思考开放科学的概念化和推广，
以实现提供认知正义的目标。」

Ismael Ràfols

> Podolynsky

与社会理论的生态转向： 专访 Joan Martínez-Alier



Joan Martínez-Alier, 2009。出处：维基百科

Serhii Podolynsky (1850-91) 是十九世纪最具创造力的乌克兰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影响力深远，却尚未被充分研究。他究竟是个推动革命的人、学识渊博的研究者，还是一个疯子？Drahomanov曾与Podolynsky合作，却和这位情感丰富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距离；[Mykhailo Hrushevsky](#) 和 [Mykyta Shapoval](#) 更将他列为乌克兰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思想在乌克兰科学院第一任院长Volodymyr Vernadsky 的推广下发扬、启发了许多作家，著名的加泰罗尼亚社会学家 Joan Martínez-Alier ——生态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奠定了所谓巴塞

隆纳学派基础——即受他影响。Martínez-Alier 教授曾获颁欧洲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最负盛名的 Balzan 奖，以及被比拟为社会科学诺贝尔奖的 Holberg 奖。在接受这两个奖项时发表的两次演讲中，Martínez-Alier 都提到了 Serhii Podolynsky。

Martínez-Alier教授本来打算发表一份以Serhii Podolynsky为主题的报告，但由于一些原因未能成功。于是，我们最后改为在本刊中，收录了这场由乌克兰基辅大学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学系的Volodymyr Shelukhin 进行的访谈。由乌克兰社会学学刊与基辅塔拉斯谢甫琴科国立大学（Serhii Podolynsky 的母校）之社会学系共同举办的「[Potential Classics: Superseded, Forgotten, and Uncovered in the History of Ukrainian Sociology](#)」研讨会（2024年6月5-6日），是这场访谈的重要脉络。这个研讨会中聚集了来自乌克兰国内外的学者，是乌克兰首次以乌克兰社会学史为主题的会议。

Volodymyr Shelukhin (VS) : 您对 *Serhii Podolynsky* 的认识是从 [Volodymyr Vernadsky](#) 的书开始的，但这本书是如何引起您的注意的呢？以一位社会学者来说，阅读一本主题是地球化学的书，好像是有点出人意料。

Joan Martínez-Alier (JMA) : 1979到1982年间，我和西班牙生态经济学家 José Manuel Naredo 一起出版了一本解释 Podolynsky 农业能源学的书，这本书以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亚文出版，也在《农民研究期刊》上以英文出版。在书里面，我做了一个总结 Podolynsky 文章中数字（以千卡为输入和输出）的表格。1986年，我准备撰写《生态经济学》（1987）一书时，阅读了 Vernadsky 的《La Géochimie》（1924）。这本书是我的朋友 Jacques Grinevald 推荐给我的，他是一位法国哲学家、认识论家、生态学家、科学史学家。除了这本书，他也和我分享了 Vernadsky 讨论能量和熵的作品，以及他为 Podolynsky 撰写的半页悼词。

VS: 在研究 Podolynsky 以及 Vernadsky 的作品时，您的资料来源是什么？1970年代时，Podolynsky 基本上被大家遗忘了。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甚至是到了2004年才以英文发表。

JMA : Podolynsky 在188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农业能源学的文章，有义大利文、德文版本，这些我能读懂；另外，也有乌克兰文，以及以俄文发布在《Slovo》上的版本，这些要有人帮忙我才读得懂。它被翻译成英文，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总之，这一篇文章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VS: 当您开始研究 Podolynsky 的相关遗绪时，您就已经知道 Roman Serbyn 曾经针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研究了吗？

JMA : 是的，我知道 [Roman Serbyn](#) 有这样的研究。我们多年前就有联络过。当然，Podolynsky 写的是乌克兰经济史：他属于一个反沙俄的乌克兰知识份子团体。在俄国，他和 Piotr Lavrov 关系紧密，Lavrov 是「Narodnik」（一种支持农民、反对沙皇主义的政治倾向）。Podolynsky也曾和马克思有过短暂的会面。1880年，他流亡到蒙彼利埃，也曾任 Breslau (Wrocław) 和苏黎世学医。他最后因为病情而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他跟 Narodnaya Volya 团体关系不错，但我会说，他确实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基辅和利沃夫的乌克兰大学，名字中都有 [Mykhailo Drahomanov](#) 和 [Ivan Franko](#)——两人都是 Podolynsky 的朋友，也是他的灵感来源。

VS: 某种意义上，*Serhii Podolynsky* 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中较不寻常的一位思想家。在工业化、铁路和蒸汽机的时代，他对自然和农业关系的关注，似乎显得有些过时。

JMA : Podolynsky曾接受过优秀的科学教育，这是他能够写出农业能源学文章的原因。他对于能源方面的研究特选应去，也在作品中引用了 [Moleschott](#) 和 [Clausius](#) 的说法。因此，他可以计算出太阳光在光合作

用中转化的能量，以及人类和动物的劳动应用在农业时，这个能量会如何增加。在他看来，能量的盈余是增加的，他在1880年用德文写给马克思的《Mehrarbeit》中提到了此点。然而，有大量的能量，是由自然产生的，并不需要人类的劳动来生产（物理意义上的生产，以千卡计量）。这样的观点，在1880年时还是相当创新的。Podolynsky 的文章在欧洲以多种语言发表，也曾刊登于马克思主义期刊《Die Neue Zeit》上，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不太感兴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并没有写过涉及农业能源学的文章。后来，一些生态学家，比如1970年代的 David Pimentel 和 Howard T. Odum 开始研究人类经济的生态能量学，以及农业的 EROI（进入田地的能量与作物的能量之间的比率）。他在作品中讨论的事情，如今成为了生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

VS: 您针对 Podolynsky 的作品，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诠释，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您的诠释提出质疑。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我们无法以社会科学的生态转向来理解 Podolynsky，因为他只把自然视为资源的复合体——他对自然有一种消费主义的看法。您会如何回应这样的批评？

JMA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0-82年（马克思在1883年初去世）曾读过 Podolynsky 关于农业能量学的文章，他们认为文章中提到的事情，对于研究社会和经济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认为 Podolynsky 尝试从物理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认为，恩格斯是不可能出错的，这点我不同意。

VS: 当代经济学、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的哪些理论，可能与 Podolynsky 的观点是类似的？

JMA : Podolynsky 超前于他的时代许多。他透过能量单位——每公顷千卡——的使用，根据农业生产/输入的现实资料，开发了一个生物质生产模型。千卡不只与输入（光合作用加上人类和动物的劳动，还有种子、肥料与现今的石油等）有关，也和输出有关。成人每天摄取的热量大约在1800到2500千卡之间。正如 Vernadsky 在1924年所写：「Podolynsky 了解生命的能量学，并试图将他的发现应用在经济研究上。换句话说，他研究的是农业的社会新陈代谢，而他的模型可应用于整个经济。他被公认为农业能源学的先驱，同时也是生态经济学的先驱。能源研究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能源研究和经济、社会史领域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和他的观点是十分断裂的（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死得比较早，其二是恩格斯在1919年首次发表的和马克思的通信中，对他的负面评论，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知道，却并不欣赏他的著作）。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被遗忘。1982年，我和 Naredo 在《农民研究期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我1987年出版的著作，让新生代的生态经济学家以及生态人类学家重新有机会认识他。Roy Rappaport 在1968年出版了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新几内亚 Tsembaga Maring 族群的农业能量学，以及社会制度和宗教。我在1972年读过这本书，当时我还没读过 Podolynsky 的文章，也不知道恩格斯有那样的反应。事实上，甚至在1971年之后，Howard T. Odum 和 D. Pimentel 发表他

们有关能源与农业的文章和书籍之前，我就已经在课堂上教能源和农业关系了。

我的结论是，Podolynsky的取径，对于不断成长的环境社会科学，以及环境历史领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农业能量学」、「社会新陈代谢」、「生命能量学」、「熵定律」和「经济过程」等名词，对主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仍然是极为陌生的。

VS：我同意，这些词汇很少人知道，不过熵的概念倒是有许多受到协力学（synergetics）启发的社会学者在使用。他们会不会对Podolynsky的思想有所知悉？

JMA：对于协力学我并不清楚。您可以阅读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s Process》（1971）。他提到过Podolynsky，但不是在这本书，而是在他1986年的文章「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in Retrospect」里。

到了1986年，Georgescu-Roegen（1979年时，我曾在巴塞隆纳见过他几天）已经读过我和Naredo一起研究Podolynsky的著作，也知道我1987出版了《生态经济学》一书的初稿。他就是从这本书得知Podolynsky的。顺便说一下，有关Podolynsky的农业能源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应，以及Vernadsky的接受程度等许多资讯，在我的著作《生态经济学》（1987，新版则于1990年出版）中都有解释。

VS：您目前的研究计画，着重于全球各地的生态冲突。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也很大程度地涉及了生态层面。虽然您尚未研究过乌克兰的情况，但您能否就此为乌克兰提供一些简单的建议？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生态挑战？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与自然和生态思维和谐共存的成长型经济？

JMA：好的。透过由集体促成的全球环境正义地图集（EJAtlas），我们尝试呈现出许多地方正为环境正义奋斗的现况。经济成长有时意味着环境的破坏，例如污染。在这些运动中，人们有类似的敌人，像是大型采矿公司。我最近读到了一个案例，是塞尔维亚投诉中国紫金公司，因为他们在博尔开采和冶炼铜矿——像这样的冲突有数百个，而且大多时候，这些企业都是跨国公司。此外，最近塞尔维亚也有平民百姓针对Rio Tinto公司开采锂元素的行为提出控诉。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经济成长都不该指向环境破坏。对于乌克兰来说也是这样的，至少在他们重新取回和平时是如此。■

来信寄至：
Volodymyr Shelukhin
<volodymyr.shelukhin1991@gmail.com>

> 摩洛哥的社会学制度化

Abdelfattah Ezzine，Espace Médiation 所长与创办者、摩洛哥社会学研究所国际调解员，摩洛哥

出处：Magharebia，Openverse



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学以社会工程学的形式诞生。当时，社会学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因工业革命而出现的、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和国家的功能失调。从那时起，社会学知识的主题围绕着对于其观察对象、方法论、研究方法的论辩和反思。它从最初的社会思想，逐渐演变为一门科学。它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在美国——被称为「societology」；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则将它称为「社会学」（sociology）——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尽管这门科学在欧洲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有着相似的制度化过程，然而，在全球南方国家（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本文着重的摩洛哥——其兴起与制度化却经历了极为不同的发展。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摩洛哥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并且能够更清楚——当其他社会学家指出自身是处于「知识的权力」而非「权力的知识」之下时，摩洛哥的社会学家所要接受的挑战。

> 摩洛哥社会学的制度化：前保护国时期

事实上，地中海地区理性主义（Ibn Rushd/Averroes，1126-1198）和社会思想（Ibn Khaldun，1332-1406）发展的关键人物，都是来自摩洛哥。然而，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与科学知识被引入摩洛哥时，却是为了占领当地、破坏并重建其社会结构，而这个目标的名义，则是「文明化落后国家」。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谈判后，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在柏林会议（1884-1885）上，欧洲殖民国家围桌而坐，商讨如何瓜分非洲大陆。

在这段期间，法国一方面希望能够正当化自身占领摩洛哥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派遣间谍和协作者到摩洛哥收集资料，以了解当地情况和社会组成。他们的目的，是建立我所说的「统治理论」（theory of domination），这有助于「统治摩洛哥」和确立保护国的关系。这些行动在1904年成立的「摩洛哥科学使团」（Mission scientifique du Maroc）中达到巅峰，该使团出版了《摩洛哥档案》（Archives marocaines），后来又出版了《穆斯林世界评论》（Revue du monde musulman）；1914年，就在摩洛哥被强行赋予保护国地位之后，在总驻军的同意，以及与原住民事务部和情报处的合作之下，其更以《摩洛哥的城市和部落》（Villes et tribus du Maroc）为名第三次出版。

> 摩洛哥社会学的制度化：保护国时期

在这段时期，社会学及相关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统治的限缩。因此，社会科学成为了服务占领国（法国与西班牙）的知识，致力于正当化占领国拥有文明、拥有将文明强加于保护国此一使命的论述。

在保护国时期（1912-56年），很少有非法国的研究人员被允许在「法属摩洛哥」作研究，同时，西班牙则开放其他国籍的研究人员进出。此外，生产社会学和社会知识的人，大多是保护国政权的行政人员（文官、武官、高级行政官员），只有极少数摩洛哥人被保留为线人或辅助人员。

>>

综观这段时期的学术作品，可以发现社会学在摩洛哥的实践，是一种渗透与臣服的工具，其目标主要是收集资讯与情报，以了解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资源。然而，在不同领域的实践上，也有着某些细微的差异；因此，我在以下各节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 「法属摩洛哥」的社会学

当时的法国社会学主张涂尔干主义。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以二分法为基础，构建了一套理解摩洛哥现实的方式，试图培养摩洛哥社会当中的冲突与对立，以达成「分而治之」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生产的知识，不仅运用于27年的和平时期，在其独立之后也同样存在。

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形塑了一些单一的实体，所谓的「学术」文献如下列表格所示。

这些概念被纳入了行政实体的运作当中；表格第一列的区域被认为适合文官控制，第二列中的区域则由军事人员管理。从政治领土的角度来看，文官区域是「有用的摩洛哥」，而其他区域只是「无用的摩洛哥」。

法属摩洛哥的社会学赋予了法国特权，将其视为「殖民」这项国际使命的先锋。总驻军的权力并没有取代苏丹的权力，而是叠加在苏丹的权力之上，并透过维齐尔（旧时穆斯林国家的重要官员，尤指为统治者提供建议的官员）的制度规避。方法上来说，这种社会学只是尝试采用了当时盛行的取径和资料收集技巧。主要的问题，在于分析与诠释——资料的蒐集与诠释，大多以原住民社会为参考，显示出民族中心主义不仅融入了概念的发展和方法，且作用于田野工作与研究结论中。

> 摩洛哥的西班牙社会学

在其影响的地区内，西班牙的行为与法国大致相同。它以所谓的科学使命作为正当化自身殖民的依据，并仰赖无线人提供的资讯。其基本理念是将当地的社会政治和领土，与被剥夺的摩洛哥领土——休达、梅利利亚、撒哈拉——做出区分。

西班牙社会学知识，以「Africanismo」的概念——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社会历史「创伤」（Al-Andalus、安瓦尔战役，尤其是内战）——为核心。这个概念也成为以各种形式，形塑了压迫摩洛哥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在此情况下，两国之间的历史，使西班牙受到文明使命的阻碍，难以对摩洛哥施行「志愿客观主义」（voluntarist objectivism）。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班牙及类似的社会学著作中的「主要功利主义」（primary utilitarianism）并不是一种专业的研究领域，而是一项结合了宗教人文主义的使命。

> 其他国家在摩洛哥的社会学实践

很少有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对摩洛哥感兴趣，或者说，很少有社会学家获准在摩洛哥进行实地研究，尤其是在1912年之后。大多数人都以当时已成为国际区的丹吉尔为基地。

芬兰人 Edvard Westermarck 从1898年到1939年一直待在摩洛哥。他的旅行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与朋友 Sidi Abdeslam El Bakali (Jbala 地区治安官) 的关系。在他的每一趟旅行中，Sidi Abdeslam El Bakali 都为他提供保护。在1817年出版《Tribes of the Rif》（1966 年再版）的 Carleton Coon 也提到，Westermarck 对西班牙人的好客、体谅和高度合作，以及他所研究的社会表示认同。

我选择这些不同背景的外国人，来呈现摩洛哥多元、多种族的社会学，是为了显示西方中心视野的特殊性。这意味着，人类学（甚至民族学）被视为「外来的社会学」，而社会学则被视为「内部的人类学」。

> 摩洛哥独立后的社会学

自摩洛哥独立以来，社会学以一种极为矛盾的形式被研究者采用。一方面，受其启蒙的菁英阶层，认为社会学是现代化的关键，其打破了马士礼格的文化传统、目的在于了解并更好地诊断社会的弊病并克服它们，迈向更美好的社会。另一方面，当权者则将其视为不方便的科学。

對立		觀察
阿拉伯	巴巴里	巴巴里人如今被称为 Amazigh，于2011年的摩洛哥宪法中得到承认。
<i>Chraâ</i> 穆斯林司法	习惯法	习惯法是穆斯林司法的变体。摩洛哥犹太人为被提及，犹太人曾是 <i>dhimmis</i> （生活在伊斯兰国家保护下的非穆斯林，享有特殊地位），根据现行宪法，犹太人已是正式公民。
<i>Bled Makhzen</i> 中央领土	<i>Bled Siba</i> 不服从的中央领土	在摩洛哥历史中， <i>Siba</i> （异见、反抗或叛乱）与自命不凡（pretension）是不同的。 <i>Siba</i> 从不质疑苏丹作为「信徒统领」的宗教地位，但反对他的政治权力。

虽然摩洛哥大学在1961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下，推动了社会学系的成立，但该学会在1970年，因多年前的事件所引发的后果而不幸解散。研究所关闭后，社会学并入哲学与心理学系，并改为从研究生阶段，才有社会学的主修。与此同时，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课程，也与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历经了阿拉伯化。

为了对抗批判性思维的兴起及其左翼政治色彩，社会学系被伊斯兰研究系取代。当时，在摩洛哥各地兴起的11个艺术与人文学院中，都出现了伊斯兰研究系。

> 殖民遗绪

尽管社会学的过去多舛，但它仍无疑是摩洛哥的遗绪之一。摩洛哥的研究人员透过「双重批判」（A. Khatibi），重新使社会学得以为之所用。他们处理了那些支持宰制理论的错误论述，也调整了那些用来收集资料的方法与技术、更反思了这些资料过去如何被不当地用于构建出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结论。这场行动不仅聚焦于摩洛哥的研究，也深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论与认知领域。

在此情境下，有些人批判种族隔离（P. Pascon、A. Taoufik、A. Hamoudi 等）、其他分析模型也迎来各自盛行的时期。殖民生产，而非殖民主义生产，也成为摩洛哥研究者的聚焦主题之一。由于摩洛哥的法语化政策，针对西班牙社会学的分析稍嫌不足，针对法国学派的讨论更为热烈。

> 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学的出现

随着国家独立，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学进入了摩洛哥。基于地缘策略取向，人们开始对摩洛哥感兴趣。在美国，有关摩洛哥的研究尤其丰富——那些希望能以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文化多样性等主题作为研究领域的人，将摩洛哥当成了做研究的沉浸式实验室（Clifford Geertz 及其学生是案例之一）。

作为先驱，杰出的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培养了学生，而这些学生如今成为教师，又相继被他们的学生所取代，一套摩洛哥人因语言、传播及审查制度偏限而难以触及的知识体系也于此形成。直到最近，英语的语言与文学专业毕业生，才开始透过翻译、评论来普及这些作品，在艺术与人文学院的其他语言文学系中也是如此。法语语言文学系除外，它一开始就没有被排除在外。得益于各系之间，甚至各大学之间搭建的桥梁，社会学变得更加丰富、成为了其他专业的基础课程。

如今，摩洛哥对各种外来的学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学得以重建以来，各艺术与人文学院纷纷设立了新的社会学系。在此之前，社会学仅在拉巴特和非斯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开设。更重要的是，当时学习社会学被视为一种左翼倾向。

> 摩洛哥社会学学派的出现：障碍与资产

我利用上述历史上的里程碑，简易地勾勒出了「摩洛哥社会学派」出现的背景。这个学派是多语的，并以阿拉伯语和法语为核心。随着摩洛哥的研究人员在寻求培训和就业方面，有了新的视野，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社会学写作，也逐渐有了进展。

摩洛哥社会学学派的制度化，受到了上述社会政治条件的阻碍，也受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管理不善的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专业——尤其是社会学——一直是被区域化管理的。由于这些专业的管理不善与使用效率不佳，其经济资源极为缺乏。此外，一些针对社会和人类研究的公共资助计划，几乎没有真的协助到社会学的发展，私人资金也未能跟上发展的步伐，而培训、专业知识、咨询与研究活动等面向中，应遵循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规范也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范。即使是某些部门间在特定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是如此。

几位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大学内外的协会组成了兴趣小组，并借此回应了社会对培训、咨询和专业知识的的需求。学生们认为，小组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教授专业指导，以提升自身技能的理想机会。这样的案例有许多，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与学习中心（CERSS）、调解空间事务所（espacemediation.org）、以及区域移民、空间与社会观察所等。

最新一波的大学改革，促成了若干实验室的设立，但它们仍受到官僚结构、繁琐的财务管理以及「学术人」心态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些实验室提供的多元化活动仍然活化了大学生活，并为国内外的大學交流创造了可能。

为了弥补这些限制，个别研究者和研究团队举办了一系列的旗舰活动。其中包括「全国社会学日」，这是一项由摩洛哥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年度巡回活动；以及由阿尔阿卡瓦因大学与拉巴特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共同举办的「社会科学春季」。这些活动采取了类大学（para-university）甚至近大学（peri-university）的工作模式，不仅促进大学与其社会、经济、民间乃至政治环境的交流，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各代研究者，以及年轻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对话与学习空间。

> 展望与国际前景

由于其多语言的特性，摩洛哥的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避开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等影响整个 MENA 地区（中东与北非）的趋势。

自1990年代以来，摩洛哥的社会学界，与各类私人高等教育及培训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促进了跨国的大学教育交流。这不仅加强了与英美学术成果的互动，也为社会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机会，使得新

兴的摩洛哥学派蓬勃成长。学术与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促使许多摩洛哥社会学家有机会前往海湾国家的学术机构任职，无论是作为移民长期工作、短期访问，或参与由这些国家资助的学术网路。这些机会不仅拓展了摩洛哥社会学学派的影响力，亦使其与 MENA 地区的其他国家练力连结，开闢了超越传统学术机构发展空间。

摩洛哥社会学研究所承袭了摩洛哥社会学网路的学术遗绪，其重组了社会学实践、推动每年「全国社会学日」的举办。在此背景之下，摩洛哥的社会学正逐步组织化，「摩洛哥社会学学派」也日益茁壮。借由上述行动，摩洛哥社会学为社会学这个学科做出了贡献，也让国际间的对话得以立基于「知识的力量」，而非屈从于单一的「权力的知识」。

我们将于2025年7月6日至11日，在摩洛哥拉巴特举办第五届 ISA 社会学论坛。让我们在庆祝多元性的同时，坚守学术伦理、确保社会学及社会人文科学不被功利主义或其他权力形式所左右，并维护学术自由与独立，确保研究者得到应有的肯认与尊重。■

来信寄至：
Abdelfattah Ezzine <abdelfattahezzine@hotmail.com>

> 重新审视摩洛哥的当代社会学

Abdellatif Kidai 和 Driss El Ghazouani, Mohammed V University of Rabat, 摩洛哥



出处：Mino Andriani, 2023, iStock

在摩洛哥，社会学研究在其思想、方法与取径上遇上了一些阻碍。首先，是研究人员对推动学科发展的兴趣不足，以及社会学文献稀少——比如说，摩洛哥缺乏较为完整的评论性文章、书评、主题性书籍、会议论文等等。其次，是后殖民独立社会学的国族特性——「国族社会学」（national sociology）于形成的过程里，正好遇上独立初期国族化的教育学院，以及一些国族主义者与君主体制之间的政治抗争，并深深受其影响。因此，在摩洛哥，要区分科学家、社会学理论家与政治家在社会学上的角色与行动，往往是一项挑战。第三个障碍，涉及了何谓摩洛哥社会学／社会学家——在摩洛哥的学术界，当人们讨论文化、知识分子、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关话题时，社会学很少成为焦点。

本文旨在讨论当代摩洛哥社会学，包括其不同主题、取径、方法以及当前的挑战。首先，我们将检视这门学科在摩洛哥的发展，重整殖民时期前、中、后的社会学文献。人们将殖民时期视为摩洛哥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推手，不过，有新一批的社会学家，尝试超越东方主义论述的限制，开展社会学的去殖民化。他们致力于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取向的国族社会学，试图以社会学为后人贡献。本文的第二个目标，是介绍摩洛哥社会学研究中的关键主题、较普遍的方法与取径，以及它们在这个研究领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我们将探讨其中尚待处理的问题。

> 摩洛哥社会学的起源

我们可以由摩洛哥的社会学研究中，清楚地看见当地于后殖民时期的政治论辩。有相当比例的社会学家受到 Mohamed Guessous 的影响，他是社会主义政党 Union socialiste des forces populaires 的成员。为了在学院中取得上位，他们制定了多项策略。社会学领域在 1960 与 1970 年代成为了政治竞争的战场，由于拉巴特社会学学院一度成为大学生与学者批判思想的中心与象征，当局因其批判与左派的色彩，于 1970 年将其关闭。

理论典范方面，1960 和 1970 年代，是由马克思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学试图对于社会的运作进行全面地分析。Paul Pascon 便采用了整体性的概念——包括社会形成、生产模式、复合社会、社会阶级、社会现实层次——来研究「Haouz」社会，乃至整个摩洛哥社会。这种强调社会整体性的观点，在其余的社会学研究中也很常见。比如 Abdelkébir Khatibi 撰写了一篇讨论社会阶级的文章，而 Abdellah Hammoudi 则运用了整合研究 (integrated study) 和整合发展等概念。然而，整体性取径后续也逐渐受到质疑。

> 后二十世纪发展与都市转向

Abdelrahman Rachik 指出，1990 年代初期，摩洛哥社会学对女性、家庭、青年和社会化等主题的研究显着增加，而这个现象与女性的价值观、社会运动与各方面的人权论述差不多在同个时期出现。这段期间，相关领域的学术行动大幅成长，摩洛哥学者也在此行列中，例如 Fatima Mernisi、Aïcha Belarbi、Ghetha Al-Khayyat、Fatma Al-Zahra Azroel、Rabia al-Nasiri、Rahma Bourqia 和 Mohammed Talal。

Rachik 则指出，摩洛哥的都市相关研究，反映出摩洛哥社会学家当时还有另一关注焦点——都市社会学的主流题目，多与住房（棚户区 and 贫民窟）、都市化、都市政策、房地产和交通有关。Françoise Buchanin、Mohammed Nasiri、Abdel Ghani Abu Hani、Mohammed Benatu、Abdelrahman Rachik、Abdullah Lahzam 及 Aziz al-Iraqi 的著作清楚地呈现出了这样的背景。根据 Rachik 的说法，这些研究大多以法语执行。

> 着手处理当代议题

此外，以 Mokhtar al-Harras、Rahma Bourqia、Driss Bensaid、Ahmed Cherrak 和 Abderrahim al-Atri 为首的众多社会科学家，则以文化社会学、价值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为研究主题。过去二十年来，这些研究人员大多以阿拉伯语执行研究，他们对新一代摩洛哥社会学家的崛起有许多助益。

有关宗教、妇女、青年和移民等当代议题，则是另一批新生代摩洛哥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他们主要使用英语进行研究。关注集体认同、社会运动、性别关系与女性状况、社会政治转型、青年与移民的 Fadma Ait Mous，是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研究贫穷的 Hicham Ait Mansour，也指出了摩洛哥学者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接纳程度较高。这表示，摩洛哥社会的研究，与全球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并能够反映普遍的现象与变化。在摩洛哥的社会背景下以不同语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根据其研究结果产生了许多理论、范例和方法，为社会学贡献许多。

> 博士论文的限制

摩洛哥社会学中的博士论文，着重于十五个研究领域：家庭、组织、空间、融合与社会关系、不稳定性与贫穷、青年、教育、社会网路、社会动能与变迁、工作、宗教、都市化、社会历史、健康与乡村社会。工作社会学、社会变迁、发展和文化是大多博士论文的重点。然而，这些论文并没有透过引进新颖的方法或概念，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使得摩洛哥的社会学领域持续地在方法论上有所缺失，阻碍了社会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由于这些论文没有发表，因此大多博士论文的研究结果，都没有被整合到后续更广泛的批判性讨论当中。

> 长期研究计划作为社会实践

社会学与公部门有明显的关联，同时，人们也期望社会学家能协助分析摩洛哥社会的重大变迁。不过，一份研究以量化方法分析了 [1960 年至 2006 年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指出社会学家在这方面的参与实为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费有限、缺乏激励研究人员的制度，以及缺乏专门的社会学期刊。由于缺乏推广科学研究的公共政策，社会

>>

学的学术实务，基本上是以个人主动或个人网路为基础，研究也是在大学机构以外的地方执行。目前对于发展议题（贫穷、边缘化、社会排除、健康与环境）的研究，较长是为了回应政治与社会需求，而不是在长期研究计画的目标底下执行。

社会学的主要挑战，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自身，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生产提供新的动力。社会学的实务，不管是针对国内还是国外，都需要更精确地界定其研究方向。考量到即将进行的改革，如果趋势是强化研究的理论架构，却缺少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定义，再多的架构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应该促进社会学家之间的沟通、协调，确保资讯流通，对研究进行审慎评估，以规划学科的科学未来。

> 阿拉伯化政策

另一项重大挑战，则与摩洛哥的语言问题有关。目前，除了卡萨布兰卡之外，所有社会学系都以阿拉伯语教授社会学。社会学的阿拉伯化过程，可追溯至 1970 年代早期，这反映出更广泛的政治观点，对所有社会科学学科都有其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由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社会文化层面，来理解人类科学的阿拉伯化。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社会学家之间的争论，围绕着其社会的特殊性问题，呈现出两极化的情况。在这场辩论中，那些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学应该为「普世」科学做出贡献的人，与那些认为人类和社会科学不能要求普世性的人互相对立。在此脉络下，在马格里布地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西亚——阿拉伯语社会学家和法语社会学家之间出现了分裂，他们追求不同的研究议程，并研究着截然不同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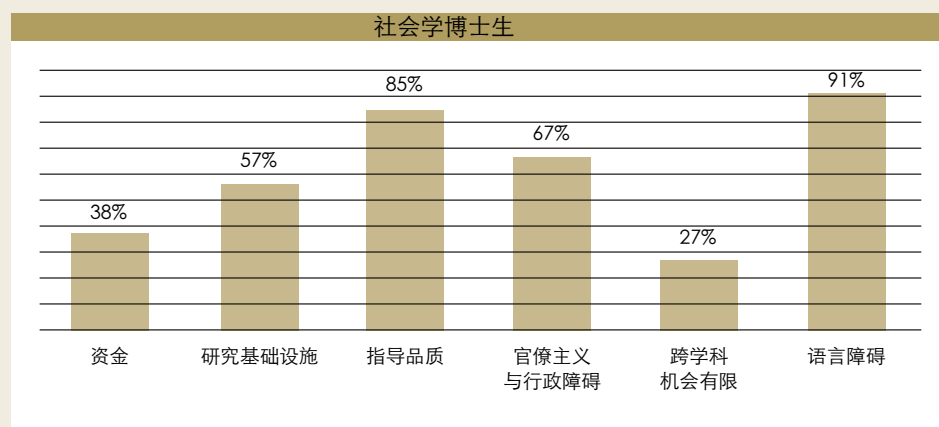
第一代摩洛哥社会学家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接受训练，受到欧洲的科学典范影响，并热衷于参与国际社会的理论与方法论辩。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年轻人的处境令人担忧。摩洛哥的阿拉伯化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正如马格里布语言研究领域的专家所言，这样的失败可能是因为，阿拉伯化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马格里布的儿童能精通其文化的语言，即古典阿拉伯语，同时掌握一门外语的能力。然而，大多数人并未能达成这两个目标。

由于语言政策的缺失，很遗憾地，这些年轻一代的人，与他们所处着的学科内部累积至今的知识，以及法语摩洛哥人能够轻易触及的跨国科学领域，完全被隔绝开了。与此同时，他们的视野，正聚焦于重新检视那些不属传统，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科学主流趋势脱节](#)的方法论。新一代摩洛哥人与社会学知识来源之间的断裂，可能会为摩洛哥社会学实践的未来造成挑战，并阻碍其融入国际社会的科学辩论。

> 社会学博士生面临挑战

摩洛哥的社会学研究涉及人类行为、社会与文化等广泛领域。然而，由于多数专相关学者倾向政治左派，在摩洛哥的社会学教育所经历的许多发展中，政治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与许多国家一样，摩洛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正面临几项可能影响其学术与研究进度的挑战（见图一）。

我们的调查显示，社会学博士生在受训期间面临许多挑战。语言障碍被视为最重要的挑战之一(91%)，其次是指导品质(85%)、官僚主义与行政障碍(67%)、研究基础设施(57%)、资金(38%)，最后是跨学科机会有限(27%)。



| 图一

语言障碍与导师品质，是摩洛哥或其他国家的博士生都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摩洛哥，博士课程通常以法语或阿拉伯语进行。对许多学生——尤其是那些过去不曾以这些语言学习，或是这些语言的能力有限的学生——来说，他们理解上课教材、撰写论文，以及与同侪和上司沟通的能力都会遇上困难。

以小众领域的主题进行的学生，可能在寻找导师上会面临困境。博士生接收到的督导品质可能差异很大：有些学生会获得优秀的指导，有些学生则面临缺乏即时回馈、与督导互动有限，或研究兴趣不一致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影响研究的进度与品质。

在摩洛哥的大学里，人们对社会学博士生的观感，会随着各种因素而异，包括师资、课程、教学经验的品质，以及提供的就业能力（见图二）。

我们的调查资料显示，社会学学生对博士班的报读有负面的看法。约有55%的人认为课程内容薄弱，而约有45%的人认为就业能力和职业前景不佳。此外，近40%的人认为老师「非常缺乏」教学经验、43%的人认为「缺乏」。另一方面，35%的受访者认为师资素质相对较好，25%则认为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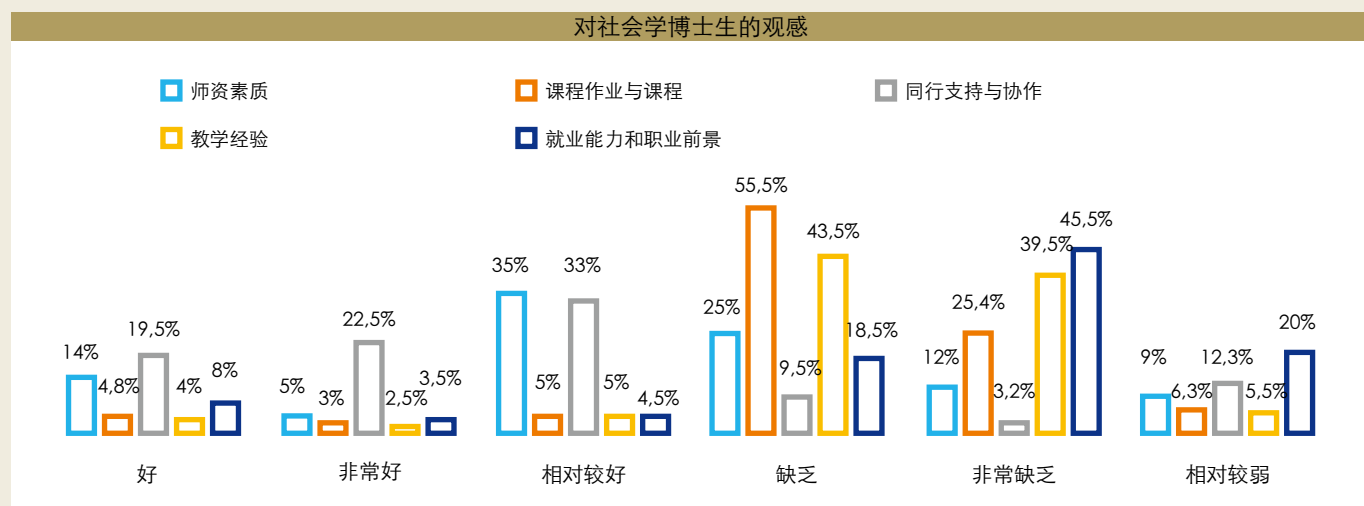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尽管国家当局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大多数学生对社会学博士的训练仍感到不满。期望接下来，新的论文制度改革，能以符合学生与大学整体利益的方式，来改善这些问题。

> 最后

如前所述，摩洛哥社会学经历过重大的转变，也面临许多挑战。在使用阿拉伯文的社会学家与使用法文的社会学家之间，存在着语言隔阂，导致研究领域充满争议。新一代的社会学家正在崛起，他们乐于接受英语的使用，并试图超越主题与兴趣之间的二分。■

来信寄至：

Abdellatif Kidai <abdkidai@gmail.com>



图二

> 摩洛哥社会学 以及一般社会学

Kawtar Lebdaoui, 摩洛哥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大学



出处：Suzy Hazelwood, 2017, Pexels

后殖民时代的摩洛哥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社会的去殖民化，以及如何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文的目的在于回溯摩洛哥社会学相对于殖民时期与一般社会学的特性，并质疑摩洛哥社会学去西方化的挑战。

盘点摩洛哥社会学史上朝向建构社会学自我的决定性转折点，使我们能够分析摩洛哥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演进之间的结合与分裂动态。

> 摩洛哥社会学的反思与非殖民化

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是殖民主义运动的关键，为他们提供了控制原住民反抗的政治策略。科学知识是一种非军事力量；它的成本较低，并能确保对被殖民者的更大控制。因此，虽然社会学以改变世界为目标，但也受到潜在的意识形态张力所引导。

在历史与政治上，摩洛哥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沿着三个区分的时期：殖民前的摩洛哥、1912年后殖民的摩洛哥，以及1956年独立后的摩洛哥。正因如此，将摩洛哥独立前的社会学定性为意识形态与殖民主义，在认识论上需要非常谨慎，也让我们能够去描述摩洛哥社会作为去殖民实体，其社会学认同的出现。

有关摩洛哥的殖民社会学文献非常广泛。官方以专书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该研究由「科学使命」（Mission scientifique）、「国民事务社会学科」（Section sociologique des Affaires indigènes）及后来的「摩洛哥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制度化，为后世的社会学家制作了「参考」文献，而后世的社会学家确实以

认识论批判的方式回应该文献，目的是创建一个从殖民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民族社会学。

为了摆脱殖民历史的缠绕，社会学转向于实证与方法论的改进。[Paul Pascon](#) 这位社会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证明。为了了解并改变社会，他选择了行动研究，展现出概念上的创造力，让摩洛哥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分离，在 1970 年代产生深远的回响。Pascon 借由「复合社会」的概念，证明了几种生产模式（部落主义、资本主义等）如何共存，而彼此之间的分界线却不一定是明确的。

新兴的社会学是由公共行动和国际组织的资助所界定的。因此，它通常以农村和妇女研究为主。虽然创始人选择了以镶嵌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点，但后来的研究人员则倾向于更多以产业为基础的研究。

去殖民社会学的先驱，建立了一条摆脱殖民主义知识及其意识形态的路线。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重新思考「社会的我们」（nous social），并重建有关摩洛哥社会的知识基础。

> 对「社会的我们」的科学挪用

摩洛哥独立时期社会学创始者的使命是为了劳工阶级的利益而促进世界的变革。他们主张与殖民主义有所区隔的社会学，在政治上代表被剥削者。

当民族社会学关注社会需求时，人类学则始终追求于理解社会。独立后的人类学文献一直致力于修正其殖民时期的对应文献。它开始进入宗教与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并且以科学化的方式取得「社会的我们」。

批判性检验与去殖民化并不意味着抹去殖民文献的遗产。尽管以欧洲为中心，但那些文献提供了关于人民、社会关系、部落动力、政治权力等宝贵的经验档案。

在摩洛哥人类学科学建构的另一层面上，意识到西方（也是殖民主义的）人类学家与在地人类学家之间的认知差距，并不表示后者一定更熟悉摩洛哥文化。

当然，两者的陌生感并不相同。就西方或殖民主义人类学家而言，由于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执着，以及将被殖民者想像成「野蛮人」、「原始」、「未开发」等，因此这样差距是在本体论上的。相反地，对于当地研究者而言，差距是认知论上的，是因为他们渴求制造对社会变革有效的在地科学知识。

为了摆脱虚伪和直接证据，当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采用 Alfred Schütz 的「[熟悉的陌生人](#)」概念。这种关于在地人类学家与殖民主义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其社区关系的反思性，将产生一种相对于殖民文献的，实证认识论上的他者性。因此，只要重新建构摩洛哥社会的科学社会学，继续探讨殖民与去殖民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这两种文献之间的边界仍然是脆弱的。

> 对于具有去西方化观点的社会学而言

尽管民族社会学在认识论上与殖民思想断裂，但仍然对殖民思想保持积极他者态度，与一般社会学并无冲突。与后者相同，摩洛哥社会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社会的法则科学，能够归纳不同的概念并建立有关社会生活的规律。但在何种意义上，它只能透过制造去西方化的知识而获得解放？

从殖民到去殖民的转变过程中，受到有利于公民的「改变世界」的社会学典范和「从内部看」的人类学典范的帮助。摩洛哥社会学创造了「由我们自己构想的社会本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学解放，没有方法论与理论的创新，也没有深刻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的反思，是无法实现的。

然而，知识去西方化的认识性的论述质疑在地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因为一般社会学是西方的，代表全球对在地的霸权。

事实上，去西方化的挑战意味着摩洛哥的社会学，如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学，必须采取去西方、反霸权的观点。去西方化的社会学意味着不仅是不再被殖民，也不再被支配与低人一等。

社会的多样性只能导致新的、可信赖的在地知识的出现，以替代占宰制地位的，各式各样的「全球化」。只要摩洛哥的经验土壤是肥沃的，建构能够描述其历史、政治与社会文化特殊性的在地社会学，就能帮助它摆脱异化，并产生与西方霸权相抗衡的在地认知空间。这并不意味着孤立，而是在「在地」与「全球」之间阐述一种相互理解，并建立一种能够为这两种尺度之间的新关系注入活力的社会学。

总而言之，社会学的诞生不仅可追溯至其创始人与早期创始者；社会学不断再生与重塑，使其符合社会的演进，也符合相关的认识论命题，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命题。因此，摩洛哥社会学需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将概念与理论去地域化、挪用典范，并建立能够为全球与跨文明的创造性知识积累做出贡献的跨国社会学基础。■

来信寄至：
Kawtar Lebdaoui <kawtar.lebdaoui@gmail.com>

> 开放与包容的争议领域

Fernanda Beigel, 国家科学研究技术委员会和知识流通研究中心, 阿根廷国立库约大学



出处: Jacek Kita, 2018, iStock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间, 我有幸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该委员会负责拟订《开放科学建议》草案项目, 并于 2021 年 11 月在第 41 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上获得批准。在与代表世界不同地区的 30 位委员会成员专家的讨论中,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在世界经济、技术、学术和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 开放理念的复杂性。由于数位基础建设的不对称发展, 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 科学开放所面临的挑战都有显著的变化, 而且从西方到东方, 在每个地区内, 甚至在一个国家内及其内部结构的异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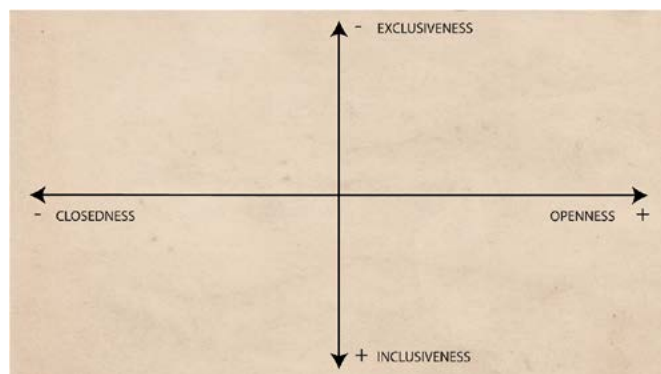
在制定《建议书》时, 开放科学最发达的面向是科学出版物的开放取用。COVID-19 大流行似乎提高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正如一些研究报告所指出的, 考虑到自布达佩斯开放取用计画 (BOAI) 以来的 20 年平衡, 开放取用诞生于一个崇高的愿望, 但演变为一个有缺陷的现实。学术出版界的既得利益者, 尤其是备受推崇的期刊 (如影响系数在 10 到 20 以上) 的出版商, 有很大的诱因将其资金转换为混合模式, 因为他们的订阅量 (虽然成本高昂) 仍然源源不绝, 而他们的投稿量也持续快速增长, 远远超过其出版能力。在开放取用中诞生的学术期刊或要求支付越来越高的文章处理费 (APC) 的超大型期刊的动态漂移, 为开放取用运动的成就蒙上了阴影。

在此背景下, 所有共同参与这场内容丰富的学术辩论的专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就是如何在促进多样性与跨文化性的同时, 扩大科学的开放性。我将介绍我最近在柏林科学技术创新 (STI) 会议上提出的概念性讨论, 作为我所做的一系列对应的框架, 以校正我们朝向包容性、开放性科学的进展有多少, 或者排他性是否正在赢得游戏。

> 包容性开放与排他性封闭之间的张力

在全球范围内, 开放科学有不同的发展路径, 它们之间相互冲突地共存着, 而它们之间的张力不仅取决于开放性/封闭性的程度, 也与包容性/排他性的两极有关。图一显示了这个冲突空间中的不同组合, 这些组合的组织方式类似 Bourdieu 描述特定场域特性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是开放性的特征; 而左边则是封闭性的特征。然而, 结合纵轴, 并从轴线相互交叉的中心点进行更实际的解读,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象限。上方象限的特点是排他性, 由商业参与者或全球学术体系的传统不对称所驱动。相反地, 在较低的象限中, 则流通着高度的包容性, 但由于主权问题或从属群体所需的保护, 开放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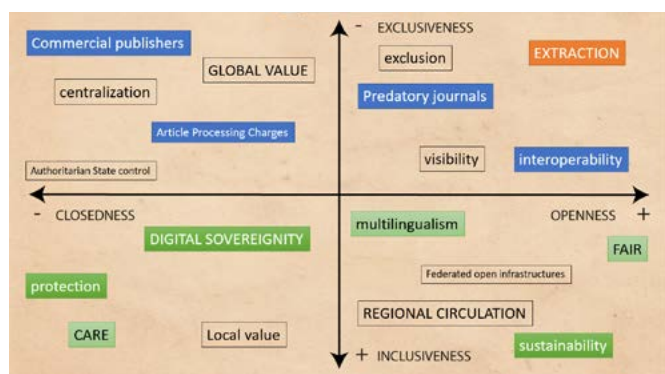
开放与包容象限图



图一

以象限来分析，这个空间是依据相反的两极来组织的；第一，以 Scopus-Clarivate 出版平台所组成的星座中佔主导地位的大型商业出版商为首的排他－封闭为特色。学术服务的集中度日益提高，而且学术界的公信力仍由这些出版商所控制，使得这个领域在全球研究评估的价值上佔有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全球资料库的结构偏见加深了对高影响力期刊以外、以非英语语言发表的大部份科学成果的排斥，并将生物多样性推向一旁。与包容性相反，这些商业出版商需要提供独家的商品与服务，以确保能获得全球卓越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定义上）是稀少且特殊的。右上象限是根据开放性的主要条件来组织的，例如协同工作能力和其他 FAIR 原则（可寻找性、可获取性和可重复使用性）。但这会在「黄金」商业模式的框架内导致严重的排除，在此模式下，开放取用期刊将出版成本转嫁给隶属于无法负担「阅读与出版」协议的机构的个人作者。

开放与包容的领域



图二

在图一和图二的右下象限，包容性开放与排他性封闭是对立的。开放存取这条道路的主要驱动力是区域出版平台和入口网站，例如 Latindex、SciELO、Redalyc、Biblat 和 AJOL，这些平台和入口网站为多语言的优质期刊创造了条件。鉴于学术界既有的阶级体系对这些期刊价值不高，包容性开放科学可能较不显眼，并以地区性流通为特色。然而，它体现了维护跨文化性、促进人类科学权利的重要努力。

在左下象限，我们看到的是包容的封闭性：这一极点的特征是知识的流通受到限制，而这些知识大多受到当地重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成果在非索引期刊上传播，许多没有永久识别码的科学资讯管理措施和数位平台，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经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咨询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中，讨论了开放的风险，涉及保护从属社区、原住民知识或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容易被提取的科学资讯的必要性：开放所有可能的，只关闭必要的，这是辩论的基础。然而，这不仅对于保护原住民群体对其在地知识进行自治管理的权利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尊重原住民群体的权利也至关重要。CARE原则正是在这种紧张局势下诞生的，如今已成为向包容性开放过渡的主要指导方针之一：集体利益、控制权、责任和道德。

封闭性可能是出于保护从属群体或是提取潜在科学资讯的需要，且能够被国家政府用来捍卫数位主权。从民主角度来看，政府可能需要保护资讯经济中，公民的个人资料和经济利益。相反，在专制政体下，这个概念被用来限制学术自由和对公民施加社会控制。

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包容性开放科学的紧张关系不仅围绕着国家开放科学政策、不平等的物质资源或商业利益。数据治理在涉及数位平台整合的争议全球计画中发挥关键作用。关于集中开放性基础建设的优点和缺点存在着深入的争论，而联邦基础建设的概念似乎出现了一条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的路线。

> 包容性和排他性动态中的利害关系人

任何一条走向包容性开放的道路都必须克服两个结构性障碍，一个依赖于物质资源，另一个则依赖于科学实践中所涉及的象征资本。第一个障碍是数位落差造成的全球不平等，以及开放性所给予，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能见度和认可的，这些非霸权研究团体带来的提取风险。第二个问题源自于学术出版和科学资讯的商业化和去商业化之间日益加剧的纷争。这些冲突超越了「钻石」与「黄金」路线之间的矛盾，因为科学家之间的认可和差异是在商业出版商设计的卓越制度下建立的。因此，真正变革的可行性最终与解决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对称问题有关。

拉丁美洲代表了一种替代性的开放取用出版体系，其中的钻石期刊由社群管理，并以科学是共同利益的原则为驱动力。然而，「主流」圈子仍然让大多数国际化研究人员相信高影响力期刊的表现效果，这使得他们不敢冒着失去认可的风险改变流通路径。SciELO、Redalyc 和 Latindex 为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出了巨大努力，政府机构和公共机构也支持着这一地区巡回活动。然而，这些组织定义的学术评估却贬低了这些期刊，导致了一种至今仍未解决的异化。

包容性面临着强大的排他性力量，这种力量是由寡头商业利益相关者推动的，他们试图集中有利可图的商品，并在封闭的生态系统下集中化基础建设。图 3 显示了左上象限中一些这类公司的例子。同时，在右上象限，符合 FAIR 原则的完全开放基础建设（例如 OpenAlex）保证了能见度，但由于 DOI、ORCID 或其他持久识别码（PID）的可用性，包容性受到限制。

在这个有争议的领域的下象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观点的强化：包容性与多语言和科学的跨文化性密切相关。然而，一些包容性出版平台在其服务中索引的文件层级的后设资料可用性方面存在限制，并且缺乏 PID 也会降低这种高品质索引产品的能见度。在我们全面遵守 CARE 原则、高度包容从属群体以及保护原住民知识的过程中，自主治理可能会与不受限制的开放发生冲突。就数位主权而言，它可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在争议领域内定位商业利益相关者和实践



图二

右下象限凝聚了包容开放的最佳典范。拉丁美洲的出版平台和储存库是走向公平研究系统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它们的主要优势在于，各国政府在将科学定义为共同利益的普遍共识下，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公共投资。这是一个异质的地区，拥有多元化的科学政策和科学资讯系统治理方法，它们共存于非商业出版生态系统中。LA Referencia 等联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在地技术的相关经验使该地区在向包容性开放科学的公正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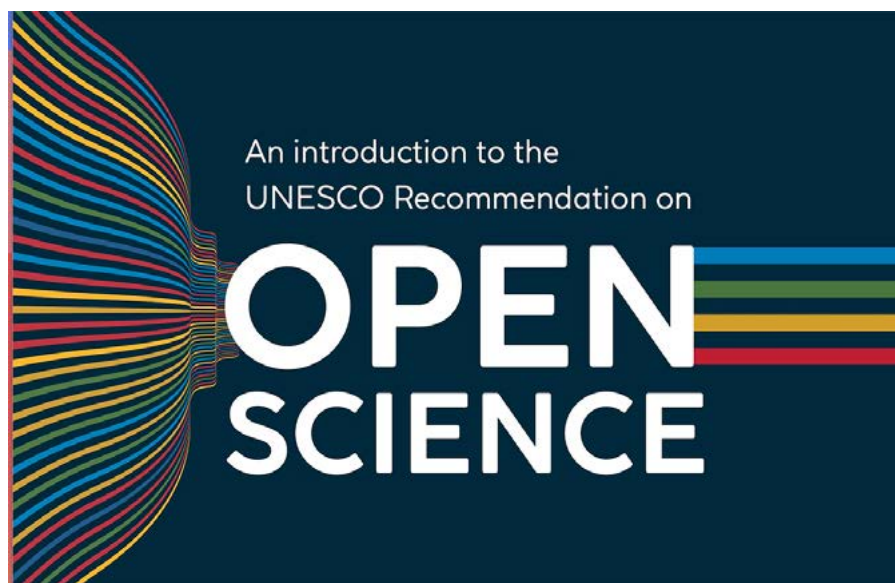
这些概念和实践上的紧张存在着，与此同时大型期刊的扩张以及快速同行评审的承诺背后正在发生着严重的变化，模糊了特定学术团体和特定期刊受众之间原有的互动。编辑管理的同质化和自动化使得编辑不再主导学术决策。商业开放取用的广泛影响似乎引发了潜在的正当性危机，这为我们带来了潜在的机会。我相信，只有透过对研究评估体系中脉络化和「处境性」改革中的「卓越」概念进行深入批判，才有可能实现基进的改变。事实上，寻求包容性的开放需要对研究品质进行新的定义，以科学作为跨文化共同利益的多语言视野作为框架。 ■

来信寄至：
Fernanda Beigel <fernandabeigel@gmail.com>

> 开放科学的辩证：

在UNESCO针对开放科学提出建议的三年后

Eunjung Sh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STePI), 南韩
Jae-Mahn Shim, Korea University, 南韩



出处：UNESCO，2022

> 「开放科学」与默顿理想

—— 十世纪中的社会学家 Robert Merton，基于对理想中科学知识该如何实践与沟通的规范，提出了现在所谓的「开放科学」。他提出科学知识在揭示（它的客观性）与建构（它应该是能自由存取）的方面应该是普世的。透过 Merton 对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规范，科学领域的学者被鼓励透过公开讨论与验证所发现的事实，来追求普遍性的知识。也是如此，科学知识才能不受个别科学家的身分、区域差异与社会政治条件所限制。不过自从 Merton 提出「开放科学」的概念后的数十年以来，全球科学领域所想像、争议与观察的开放科学的实际规范，似乎与他的概念性的规范有相当大的差异。

近数十年来，研究人員在科学领域经历了日益剧烈的商业化与同侪竞争问题。这种趋势最终促使个别的研究人员，倾向他们的想法和研究发现保留在封闭的圈子内，而选择不更开放地和其他社群中的同侪分享。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数位技术与网际网路存取的进步，使得科学出版品与研究资料得以公开发表，能让相关利害关系人得以更及时地取得资料的。因此，正如Karl

Polanyi的建议，在以上这两种情况的发展下，独立的科学家与地方、国家与地区的科学社群已经见证了非常异质的开放科学的实践规范。尽管 Merton 开创的开放科学的理想仍未改变，但开放科学所被实践的实际状况不仅是历史性的，也必然是一个充满了不同的想法与该如何实践理想那争议重重、辩证与建构过程。

为了回应开放科学的多层次辩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挥其召集力，在它 193 个会员中展开全球对话，并终于在 2021 年发表了《[开放科学的建议](#)》。该建议书同时支持科学知识在全球的普遍性与在地方／区域的多样性，并且认为这是极需共同努力的目标。一方面，它重申全球对开放科学及科学知识应具备普世价值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也使科学知识得以蓬勃发展。它呼吁全世界的在科学领域工作的人都该努力，在科学界内、外重振开放科学。另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书》揭示了实施开放式科学时不可避免的多样性，并提倡多文化和多语言的知识系统。全球社会坚持默顿规范（Mertonian norms）的普遍主义；但在推进普遍性时，也需要认可和倡导多样性的重要和世界各地的地方价值。

> 开放科学在南韩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书至今已通过三年。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确认以下旨在阐述南韩（正式名称为大韩民国）开放科学特征的行动。相比那些已经完整建立有关开放科学政策或计划的国家，韩国目前尚未有涵盖讨论开放科学该如何实践的全面性框架。尽管如此，过去十年中，随着全球对于开放科学议程的制定，他们至少产生了四个独特的动向。

首先，政府资助那些已推动公共政策措施的机构，以提高公共资助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利用。上述的策略是基于一个基本的逻辑：民众应该可以由公共投资中获益。尤其是 COVID-19 的爆发，加速了公共部门主动分享研究资料，以对抗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并保障公共物品。即便现在无条件地分享 COVID-19 资料已不再被实行，但针对公共资助之研究成果得以公开取用政策仍然有效。

其次，资料驱动研究（data-driven research）或 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对研究的辅助都促进了资料的管理与分享。私人公司、韩国政府和公共机构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和资源进行投资。此外，针对所有科学知识领域提供服务的通用资料平台，也已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出现。而且在特定领域的资料中心（生物研究、材料科学、生态学、地球科学、高能物理、公共卫生研究等等）和机构资料库的数量也在增加，并且以特定学科或机构为中心的规则和标准也随之被制定出。

第三，学术机构和图书馆也不断采取能和全球持续发展的资料开放、取得出版的环境相互因应。随着全球以及韩国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透过国际开放存取的期刊发表论文，国内图书馆也面临更大的适应压力。它们会被要求考虑旧有国际期刊订阅之模式，并讨论是否以能平衡目前订阅成本费用其他方式（如转型协议），去推动资料开放存取的出版。而这种具「掠夺性」（predatory）的期刊和会议，毫无疑问地被商业利益主导，并成为推动资料开放存取出版的另一项挑战。无可否认，学术出版界的产业正经历转型，促使学术界重新调整他们原有的行为模式。然而，不同学科、部门和地区的可取用资讯，以及与这些转型的潜在风险各不相同，也导致出版的实践经验是非常不同的。

第四，公民科学家、当地社区和学术界外的人都已经成为科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们的参加和贡献在生态学、天文学和公共卫生研究中尤其突出。新兴科学参与者所引进的新颖观点与兴趣，会使得知识有崭新发展的轨迹。与此同时，这些发展轨迹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不同声音或造成争议的紧张局面。因为，人们倾向于保护在地环境中的内源性知识，但这种倾向正受到意图将知识由本地环境拉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的呼声挑战。同样，过往倾向保护受试者隐私身份的规范，也受到为研究目的而应该被破例的要求所反对。

> 开放科学的辩证

[知识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曾建议](#)，任何事物的真实性与存在，它应该有一个理想的典型，并且建构在具体的类型与异质的辩证中，而这些类型与异质性往往是互不相连的。基于同样的精神，本文简略探讨韩国开放科学辩证法的几个不同发展。并就其现状来看，每一个都是侷限于特定情境中的断裂实践经验。只有历史观察者才能看到它们在未来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子。依据它们所遵循的路径，[Robert Merton](#) 对于开放科学理想原型将会具体化与真实化成为现实。可以确认的是，开放科学正在这些细节中发展，并向我们迎来。我们只鼓励人们更密切地关注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目前和未来的发展。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将在2025年进行的国家报告程序，将是一个提供各国开放科学进行辩证与讨论的珍贵平台。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对这些辩证进行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充分理解新兴的全球开放科学的辩证，并了解我们所将面临的的具体任务。 ■

来信寄至：
Eunjung Shin <ejshin@stepi.re.kr>

> 非商业化的科学： 是否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想像

Ana María Cett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墨西哥



出处：基于 Freepik 影像的蒙太奇

正如 Mirowski 和 Sent 所指出的，「[科学的商业化](#)」是种异质现象，它无法用简单的定义来界定；这也使得多数当代关于它的讨论，至今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样不幸的状态主要由于科学它本身的定义所造成，从作为既定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制度规范的科学，到作为过程的科学，甚至到科学作为一种过程的产品，所有都是能代表科学的定义。由此，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含有许多层面，适合采用多面向的方法讨论。本文所提出的方法难免有其片面性和局限，但讨论将主要聚焦于科学的商业化。

> 从历史的角度一瞥科学发展

透过检视历史会发现，科学在被构想或命名前，贸易已成为知识生产、使用和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欧洲人

所建构的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很大程度是受益于来自远方领土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是透过航海、殖民或征服而来的。因此，这些知识若被去脉络化，它就会成为科学文献的一部分，甚至是经济利益的来源。几世纪以来，南方热带地区的香料、药草和其他天然物产的贸易就为欧洲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另外，几个世纪以来，知识一直都是在全世界被产生和分享的。犹太裔的葡萄牙医师 Garcia da Orta 所建立的知识网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563 年，他因为在果亚邦首次出版关于亚洲水果和草药医疗用途的著作而闻名。事实上，Garcia da Orta 与印度、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的宫廷医师，以及航行到中国、印尼和东非沿岸的旅行者所建立的网路关系，是 Garcia da Orta 这些知识重要的来源。但 Garcia da Orta 也是个生意的人，他推广

>>

了药用植物和宝石的销售，并将它们出口到欧洲。此外，他的著作内容复杂、篇幅庞大，其中 [59 章还被翻译成简易版的著作](#) 在欧洲流传，着重于挑选最有用的药草类别，以作为医疗和商业用途。毫无疑问地，自十九世纪以来，他就被描绘成一位「科学伟人」和「热带医学的先锋者」。

自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大发现和征服航行以来，知识从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的流通就没有停止过。不过，这也导致这些产品知识脱离了根源，而被商业化。

> 资金制造机

历史上知识流通的不对称，至今仍然存在。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我们皆在不同程度上对今天人们所知的科学知识做出了贡献：在国际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一个被不断成长和日益成熟的实践者，而我们也滋养出了政治和经济合法化的知识体系。然而，不对称的现象仍然存在：全球南部对科学的贡献，其商业价值较低，也因此市场对它的兴趣就较少。除此之外，一方面，我们的科学产品在自身国家很少被用于具经济价值的应用；另一方面，它们也大致被全球北方的实践者忽视。

简而言之，我们的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屈服于一个有权、有钱、有手段来决定哪些科学才是「重要」的体系——它是一个深受二战后，以效率为主体的泰勒科学管理模式 (Taylorist efficiency models) 启发为原则的工业体系。科学产品的商品化、科学出版及其影响主因——「货币」，上述都是科学企业工业化可想而知的结果。

让我们回想一下，商业出版模式是在私营公司开始接学术机构的期刊出版时出现的，而学术机构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仍是主要的出版商。这些学会会将编辑与行政管理交给商业出版商，并偶尔收取报酬以支持学会的活动。Robert Maxwell 将这些出版商形容为「永久的资金制造机」，因为它们看到了有利可图、具庞大市场价值的商业模式后，就提出了一个富有野心的计画。因此，科学家会做所有实质性的工作，不只是制作内容，也就是科学家不只产出所谓的「原始资料」，它们也会担任编辑和审查其他作者的手稿。而后，这项安排更扩展到所有稿件的打字与格式编排，在网际网路时代之前，稿件必须「准备好印制」(camera-ready)，而现在则是「上传就绪」(upload-ready)，将稿件送到期刊平台。但若是依照此模式，出版业还能要求什么呢？

> 一瞥现况

事实上，还有更多事正接着发生。在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同时，书目数量和科学计量的服务也随之诞生，许多地方也将其作为（个人和机构）「优秀表现」的指标，并加以推广这样的评断标准。这也促使科学活动自二战结束以来持续地扩张。

然而，这种由商业驱动、着重于生产力的扩张，并没有伴随着相应成长的科学品质和发展；甚至，有些分析家提出科学反倒呈现了停滞的状态。这样的情况，在科学内外应用以及现代技术的基础的基础边缘研究方面尤为明显。此外，由书目奖励措施所创造的市场，再加上开放取用的「黄金」模式之采用，使得少数的大公司形成了跨国的寡头垄断，它们负责了全球约 75% 的已发表论文。更甚，这些公司在机构或国家层面签订商业协议，它们将价格逐年提高，现在已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和许多学术机构的预算能力。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公共财的严重流失。

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大型牟利出版公司的出现，并非科学霸权体系的失败，而是体系本身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造成的另一种状态。若要找对象责怪，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市场主导的体系上，这样体系几乎渗透并颠覆了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尤其是关于人类所创造的事物。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理解，在艺术领域，一位年轻的美籍华裔企业家花费 620 万美元购买了一件由固定在墙上的香蕉组成的「艺术品」，只为了在记者会上吃掉它来「创造历史」？

> 知识作为公共财

Hardt 和 Negri 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时，显示了公共财——那原该属于全人类的东西——如何被市场和金融体系封闭了。空气、水、地球上的果实和大自然是公有资源，它供给了我们一切；而社会生产的成果也同时该被划入公有资源的范畴中，例如知识、语言和资讯。后者是社会生产的资源，因此属于我们所有人；然而，由于资源的被商品化，绝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它们。

科学知识是一种公共财，更多人获得，并不会降低它对任何人的价值；相反地，它会让我们更充实。原则上，科学知识应该是高品质和值得信赖的，这样才能获得大众对科学活动及其产品的广泛支持。尽管，人类社会目前所实践的，与上述的理想相去甚远。

在讨论公共财的管理时，Elinor Ostrom 并未区分自然资源与知识等非物质资源。在这两种情况下，她认为个人管理资源的能力各有不同，这取决于社群是否有可能并愿意制定一套协议和游戏规则来管理。

> 将科学出版非商业化，以保留所有权并控制传播

根据 Ostrom 的论点，学术界必须愿意自我管理；具体来说，就是重新掌控知识产品的出版。在这方面，拉丁美洲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科学期刊都是由非营利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因此，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纠正知识生产倾向商业出版的矛盾做法，并防止由国家公共资源资助的科学知识生产群体，继续臣服于垄断市场的出版大公司。

自「钻石」(diamond) 开放存取一词在全球北方被提出，而全球南方在此概念被提出后就采用了此概念，让

作者与读者可免费出版。现在，这样的出版模式已成为拉丁美洲的主流做法。它确保学术界保留对其产生的知识的所有权，并管控其传播的管道，建立使它应该被获取的良好渠道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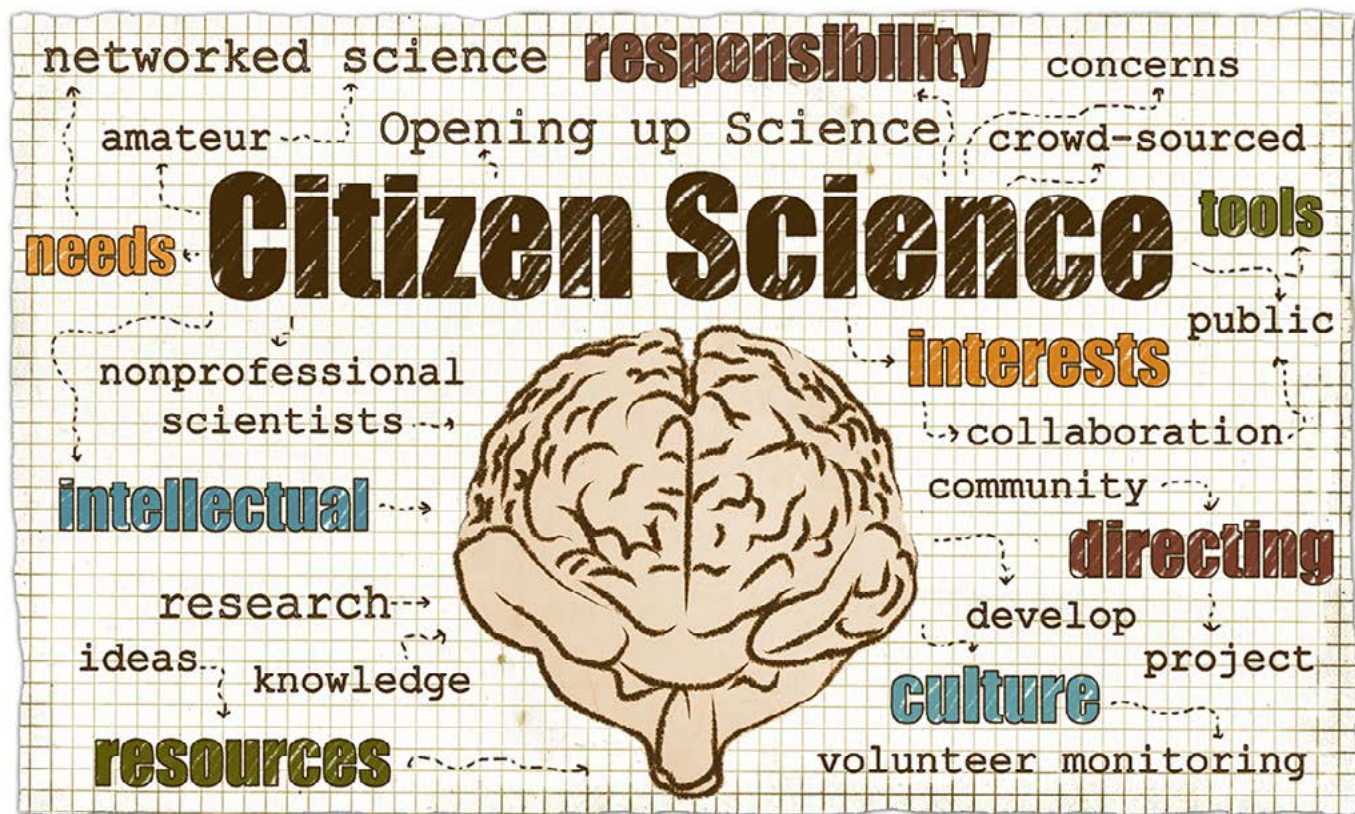
将科学知识非商业化，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除了处理其他事项外，还需要对科学的社会价值与目的进行全面性在心态上的转变。出版业的非商业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是在现实层面，需要政策制定者与科学界的一致采取行动才能带来改变。有些机构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第一步，取消订阅大型营利性出版商的刊物，或是改变学术评估的标准。然而，这只是一连串改变的开端罢了。 ■

来信寄至：

Ana María Cetto <gna@fisica.unam.mx>

> 公民科学与新型的权利议程

Sarita Albagli, Brazilia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BICT) 和公民科学研究所, 巴西



出处: TL Furrer, 2017, iStock

公民科学在近二十年来蓬勃发展，提高了各国公众政策和国际组织议程对其的重视程度，并与社区科学、参与式科学和科学的公众参与等活动对话。公民科学包含了多元的概念、实践、方法论和主题；它亦是一多义词，会根据使用的对象以及其动机、目标、观点和背景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定义。公民科学将随着当下的脉络和条件扮演不同的角色，它可以是追求社会贡献的一起科学计画，也可以是追求科学团队支持和认证的社群倡议。

> 实用与民主的观点

这里有一个值得先探讨的问题：「公民科学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从公民科学计画中观察到两种观点，它们不必然得对立，反而可以是互补的。

一方面，从比较实用的角度来看，公民科学的动机是动员非科学家们去收集、分析资料，以减少成本、加快研究的速度，并扩展研究领域。科学领域对异质和各地区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也代表单靠科学团队的努力在大多数的情况中已不再是最有效的方法。

另一方面，公民科学要求不同社会团体的知识和观点尽可能地被看见和认可，以此提供新的科学洞见并为社会创新和问题解决创造新的贡献。以上是从更公民的角度看待公民科学的观点，要求尊重聆听并且创造不同知识类型间对话机会的模式，这其中包含了由下而上、参与式和共同生产的方法论。

> 制度化和多元性

公民科学的其中一个挑战是要如何在容纳多元观点的同时，确保公民科学计画的长期发展。一方面

>>

来说，这要求研究审核制度和金援体系对公民科学的认可及资助；另一方面，则又需要避免过去僵化的制度模型，以固定的标准来定义何为公民科学计画；而是能够肯认公民科学的多元、开放和创新性。我们需要将这种科学方法视为一个仍在建构且不断改变的概念与过程。

不同类型的倡议不必然需要被称作公民科学，不过仍可被视作领域中的一环。在拉丁美洲已经累积了大量在研究和教育中使用参与式取径和方法论的经验，哥伦比亚社会学家 Orlando Fals Borda 和巴西教育家 Paulo Freire 的开创性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在巴西，自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以来，公民科学倡议已逐渐受到关注。自2021年巴西公民科学网 (Brazilian Citizen Science Network, RBCC) 创立至今，吸引了超过四百名的参与者。2022年4月，巴西的科学与科技资讯处推行了一个[公民科学平台 Cívís](#)，上面登记了超过两百件拉丁美洲的公民科学倡议和计画，其中有过半数来自巴西。这些倡议中包含提起人们对赏鸟等科学休闲活动的兴趣 (详见[Wikiaves](#))；受社会环境灾害的社区在大学团队的协助下，统计资料并以此为社区的权益抗战 (详见「[Que Lama é Essa](#)」：这是什么泥土?)；动员公民科学以环境保护做出行动的计画 (详见[Blue Change Initiative](#))，和保护海洋与沿岸环境品质的计画等。

> 公民科学作为一种开放科学

公民科学目前属于开放科学运动的一支，不过关切的重点不仅仅是开放数量的面向，也就是知识取得的途径，也包含了品质层面——即关注我们希望生产的知识类型，亦即对多元观点的开放性。这也就代表了，公民科学的实践和方法不仅限于开放取用和开放资料的原则与协议。因为考虑到参与公民科学倡议的异质行动者各自处在不平等的地位和位阶，所以开放资料不仅需要依循可触及、可取用、可协同操作和可重复使用的公平原则，它还需要关注原住民所提出的照顾原则：集体利益、控制权威、责任和伦理。在可行的情况下，还需要采用预先、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协议，确保将研究结果回馈给参与者，并提供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随着公民科学计画对手机软体、录音和测量工具、侦测装置和数位平台等数位工具的使用量增加，开放基础设施同样也必须受到关注。尽管这些装置促进了数据生产和记录的去中心化，但同时也致资料于窃取和盗用的危险之中。这涉及到新兴的平台经济——或说平台资本主义——将威胁到资料的主权，也就是资料所有者对于资料生产和使用决策的能力和自主性。这些平台通常都提供了使用者友善的操作接口，却鲜少提供他们营运与获利策略的相关资讯。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不只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存在某些危机。不只如此，数位排斥的问题仍旧存在，影响了那些仍无法充分取用网路的地区和社会群体，并使他们容易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影响和操控。

以上的这些问题和其相对应的措施都必须被纳入公民科学计画的考虑范畴中。

> 冲突场域中的公民科学

有人认为我们需要公民科学来解决当前的全球社会环境危机，然而建立一个「共同的未来」并不一定是合意或和平的。这些危机的原因和影响不均匀地分布在国家、地区和社会阶层间，因此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对世界观和发展模式的不同乃至冲突的立场。以环境保护和自然开发力量为例，两者之间尤其在涉及高度社会不平等和政治脆弱性时，常会出现争执，甚至暴力行为。对于寻找替代发展模式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会使科学逐渐包容其他价值或实践，甚至促使科学权力结构发生范式的转移？

许多人指出西方科学的范式为发展和认识其他多元的科学轨迹和知识类型设下阻碍，而这些被隐蔽的知识正可能是发展永续的途径。在此脉络下，出现了一套有关知识和科学的反霸权论点，用米歇尔·傅柯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被征服知识的叛乱」。它们源自受到社会运动启发的各种思想脉络，包括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及酷儿理论、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与去殖民主义、底层研究、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知识生态学和全球南方的认识论。

倡导以上思想脉络的人们力求让传统和原住民、高风险群体、弱势人口、污名化群体和非正式专业或经验的知识以及边缘科学的世界观和认知框架得到更多关注。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些人的角色在面对当前全球危机时被重视，并倡导他们所认为的认知正义、范式转移与边界思考等理念。

> 对抗假讯息：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

在这些情境中，公民科学的角色不仅限于填补资料的缺口，以监测永续发展目标的达成程度。它还发展出与不同思想和行动脉络的对话、促进不同本体认知基础间的互动，也就是不同生活和知识理解间的互动，并且使与生命永续性更具平衡连结的知识实践被看见。公民科学同样作为一种科学和环境教育的手段，促进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在当前社会充斥假讯息和抹黑科学的状态下，例如伴随着假消息和假科学的散播，出现的否认气候问题或反疫苗等活动，公民科学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尤为重要。

公民科学可以成为强化公民身份的契机，对那些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人而言尤其是如此。在使不同行动者和知识场域之间的关系更加水平化的过程中，公民的概念也正在被重新诠释。公民科学可以提供工具来支持数据和认知行动，以扩展对区域管理和公众政策的社会影响，这其中也包含了一种崭新的权利议程，特别是「研究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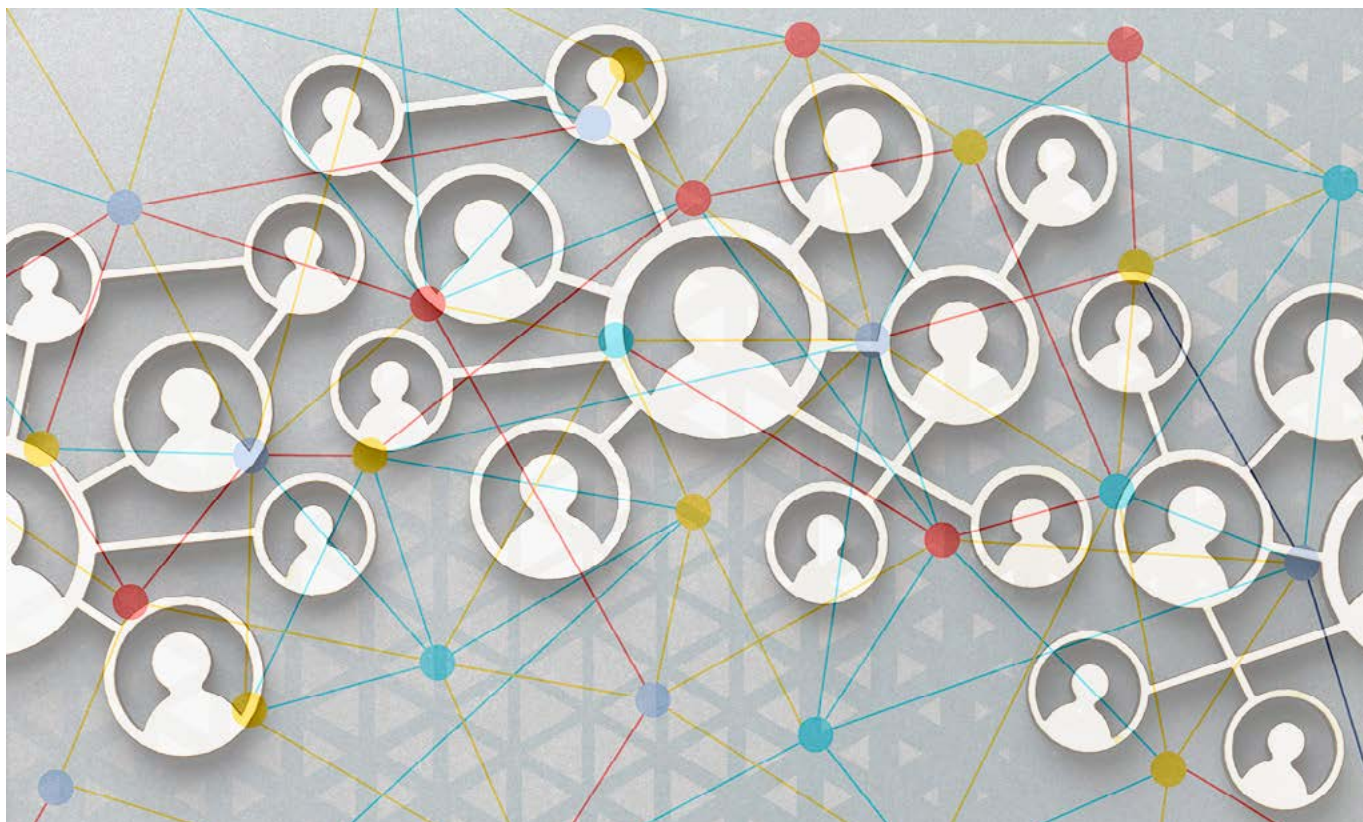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希望促进一个科学内部和超越科学范畴的广泛对话，那以上所讨论的将是一个关键的议题。这类对话的存在也代表了，一种从不同知识体系间共存伦理发展而来的多声视角正在形成，呼应了沟通一词的原始意义——「成为共同体」。 ■

来信寄至：

Sarita Albagli <sarita@ibict.br>

> 重新思考开放科学： 迈向公平与包容的关怀

Ismael Ràfols，UNESCO Chair i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Global Science，
Leiden University，荷兰，INGENIO，University of Basque Country (CSIC-UPV)，
與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València，西班牙



| 出处：基于 Freepik 影像的蒙太奇

> 成长的阵痛期：更多开放科学面临矛盾加剧的情况

开放科学（Open Science，OS）代表了一种新的科学工作模式。它以合作工作和分享知识的新方式为基础，通常透过数位技术或其他合作工具来进行科学工作。此外，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21 年的一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希望开放式科学将「为了科学和社会的利益而扩大科学知识的普及，并…（中略）…促进创新和参与创造科学知识，以及分享科学知识带来利益的机会」（UNESCO，2023）。

有鉴于这些潜在的好处，开放取用的出版物、资料分享和公民科学等活动被更大力度的推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内，这些活动已越来越普遍。然而，我们最近针对

开放科学分析后，发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趋势——是的，开放科学正在蓬勃发展，但它拓展的方式却让人怀疑，它是否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并提升科学的社会影响力。

总体来说，人们的目前对发展开放科学之作业系统的印象是，它似乎出了某些问题：第一，[目前的开放科学正在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此外，[目前发展开放科学的方式，所造成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是不清楚的，或说它是有其限制性的](#)。

首先，开放科学造成更多不平等的讨论上，有更多经济资源的大学和国家的研究人员（就像我的情况），比身处资源贫乏环境中的研究员享有更耀眼的特权。因

>>

为我们的机构可以支付（通常是相当昂贵的）费用，并透过开放取用（Open Access）发表文章。尽管这样会让一些知识变得容易获得，但却违反了基本原则，即科学贡献应该依据其学术价值，而非作者的财富多寡来被评判，或得以刊载呈现出来。因此，许多相关人士认为，付费出版模式（过去称为「黄金」或混合开放科学）正在使研究体制败坏堕落。「钻石」的开放取用（免费的出版与阅读），显然地造成出版商的损伤，[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区](#)。因此，[在西欧，出版的潮流由付费出版，也逐渐转向机构支持「钻石」的开放取用期刊](#)。

其次，[根据近期的一则评论](#)：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开放科学的社会效益了解很少。其实，公民科学和其他参与方法，像是与政策制定者和利害关系人的互动，像这样的社会互动，才是研究结果主要能被实践和做出贡献的方式。换句话说，社会影响很少能单单透过论文或资料发生，是透过社会这个舞台，在社会参与者与研究人员之间来回「转移」（transfer）知识才得以被实践。这些质疑的发现，目前是聚焦在许多开放科学政策在技术平台上的投资。

根据这个观察，我将论证开放科学的概念化和推广开放科学需要重新思考的部分，如此一来，我们才可能到达知识正义的目标。

> 开放科学是一种转变，但它转变的方向为何？

正如我们所见，开放科学的发展有两个主要动力。第一，资讯数位化带来了生产、传达与储存科学知识的新方法。第二，期望这些开放科学的新方法更能促进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已和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批判被联系在一起讨论，我们希望科学研究更能回应社会的需要、所求与期望。

根据我们追求开放科学的原因与期望的目标，我们[为它的实施制定了不同的议程](#)。部分更着重于提高研究系统的效率，部分则着重于平台技术的开发或是扩大资讯的撷取的范围，也有部分专注在系统的参与度程度。虽然原则上这些目标应该是相辅相成且不相互违悖的，但在实践过程却出现了紧张和矛盾的状态。

[如果我们把开放科学理解为研究系统的改革](#)，那么开放科学的每一个愿景都会把研究推向一个与其他愿景互不兼容的方向。例如，从资讯平台的角度来发展开放科学的话，往往会与开放科学的包容和参与程度产生冲突，因为在全世界人口中，部分阶层的人们并未享有或具备透过这些平台参与的能力。或者，举例来说，透过付费出版模式实现更多的开放取用，在公平性（因为资源不足的环境下，研究人员则无法付出足够费用取得资料）和研究伦理（因为[某些付费出版的期刊，如 Frontiers 或 MDPI，它们审查的严谨程度是备受质疑的](#)）层面，也和开放科学的中心思想相违背。

总而言之，开放科学的未来并非只有一条路，它其实有更多不同的潜在走向，这些走向也决定了开放科学是具备了哪种类型的存在。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并非是迈向

更多开放科学其进展的程度，而是究竟哪种类型的开放科学被开发、采用？它又是由谁开发和被谁采用？以及使用这类型的开放科学，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科学政治经济学家 Philip Mirowski](#) 曾警告，主流的开放科学和它资讯的基础建设与「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息息相关，此现象的详细状况可参见 Soshana Zuboff 的「监视的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此外，它还涉及类似 Google 和 Facebook 等社群媒体所拥有的危险：Elsevier、Clarivate 或 Springer-Nature 等等大型垄断市场的公司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从实验室笔记到出版、评估分析等），它们控制了公开的研究资讯，并有权力塑造集体行为与科学愿景。而且这些公司通常在美国与欧洲政策的支持下（例如早期的S计划），不仅从全球南方大肆攫取财富，也有可能[性制造出强化全球北方霸权的科学表象的能力](#)，使其主要的科学议题、学科、语言、价值观与文化观点更为明显。

尽管如此，在这些平台的平行与摩擦发展下，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都在发展集体倡议，为多元与包容的开放科学轨迹提供其他可替代的方案。例如，[La Referencia](#)、[亚洲参与式研究](#)、[公共知识计画](#)或[巴塞隆纳宣言](#)。问题在于，在未来可选择的开放科学路径中，哪个方向更符合知识正义。

> 由谁来推广开放科学？又是为了谁而发展开放科学？

根据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开放科学的建议书，它们将公平和集体利益确立为开放科学该追求方向与最关键的价值。这样的重新定义，对于开放科学影响甚大。它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提及：「每个人皆有权利自由参加…（中略）…和分享科学进步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它们将科学知识视为全球的公共财，并将开放科学中的「开放」两字，视为使知识真正成为公共和全球知识的目标。

[正如 Michel Callon 所说](#)，科学并不是一种传统的公共财。因为它不仅要参与者参与其生产，还要顾及它的制造、维护和使用；因此，我们需要对作为这样的参与者来投资自身实质的能力。因为，任何公民都会呼吸到干净的空气，他也是一种公共财，但却不需要特别的努力来维护它，甚至不一定会意识到原来它也属于公共财的一种。然而，我们若要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使用，那么备有先备知识以及互补的资源的能力，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举科学专业知识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取得有关癌症的科学刊物。但即使如此，在诊断出癌症病征时，只有专家才能使用这些科学论文来决定采取哪种适当的治疗方法。而我们其余的人，则需要仰赖针对一般读者的科普报告；因此，[这些科普资料（非科学论文）是知识分享的关键](#)。

关于资源，我们仍可以假设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还是可以取得拥有科学知识资料的网站。但实际上，他们往往无法使用这些网站资源，因为资料分析需要基础的建设或是特定人员来操作，但他们通常却负担不起这些费

用；在最坏的情况下，光是网际网路连线，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费用昂贵，或是网路收讯不加，甚至可能发生被封锁（因为被制裁）**等问题。

简而言之，在全球南方，网路的可取用科学资讯往往无法被善用。文章、资料、软体等等的科学资源与产品可以公开使用，是受益了本就拥有强大能力与资源的组织与公司。即便如此，仍需要针对个案地去「转移」（transfer）与帮助个案适应，才能让知识触及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并使他们成为受惠对象。若是仅仅以数位化的方式提供知识，主要受益的还是那些已经有机会获得知识的人，而无法促进世界上多数的人口参与在分享科学所带来的好处中。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开放科学所采取的方向，亦即它专注在科学产品的免费使用这方面，事实上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公平和知识上的正义。

> 脉络化的开放性情境：从「获得知识的产出」到「与知识连结」

尽管，另类形式的开放科学可以带来更多的公平和影响力。由 Leslie Chan 领导的[开放与合作科学发展网路\(OCSDNet\)](#)提出了[达成科学知识的开放性目标需要情境化](#)的论点。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才能发展特定形式的参与和沟通，这也使科学知识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边缘化社会社群）有了价值。

这种情境的脉络化并不能单透过专注于让研究产品能被数位化取用来实现。相反，[正如 Sabina Leonelli 在近期一本书所发表的](#)，重点应该放在研究人员与社会社群之间的知识交流过程。这些过程通常会受益于数位产品的开放取用。但尽管如此，特定形式与平台如何被使用，是会随经历特定知识交流过程的不同参与者而有所差异。

开放科学运动承诺了实现知识正义的母标。许多社运参与者认为，[私人参与者（主要是寡头垄断的出版商）抢佔了目前的发展](#)，但或许那些强大学科（例如基因组学与高能物理）的大型研究基础设施被发展也是由此原因而起。最后，为了重新获得解放的力量，以及对公平与包容的关怀，开放科学需要重新定义自己，而非从产品与技术平台的角度（许多产品与技术平台都被产业组织或「大型科学」机构所有），而应该是在更谦虚平等的环境中，跨越更广泛的社群，来进行知识的交流。■

来信寄至：
Ismael Ràfols <i.rafols@cwts.leidenuniv.nl>

> 极化与政治的冲突： 来自拉丁美洲的洞察

Gabriel Kessler，阿根廷国家科研委员会-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圣马丁国立大学，以及
Gabriel Vommaro，阿根廷国家科研委员会-圣马丁国立大学

出处：Matheus Ribs，[@o.ribs](#)，2021



正如 Gabriela Benza 以及 Gabriel Kessler 所指出，拉丁美洲经历了始自 2019 年并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恶化的，一段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且社会政治冲突加剧的时期。那些在二十一世纪初煽起变革之风的左翼势力，最终成了受到挑战的「建制派」。与此同时，右翼反对势力的崛起预示了一场政治转向；但这一转变最终没有发生。随着大宗商品繁荣（commodity boom）的结束，拉丁美洲的政治不满日益加剧，随即又因疫情而得以深化。这种不满体现在大规模抗议、选举行为的各种变化、对民主保持的负面态度，以及激进右翼主张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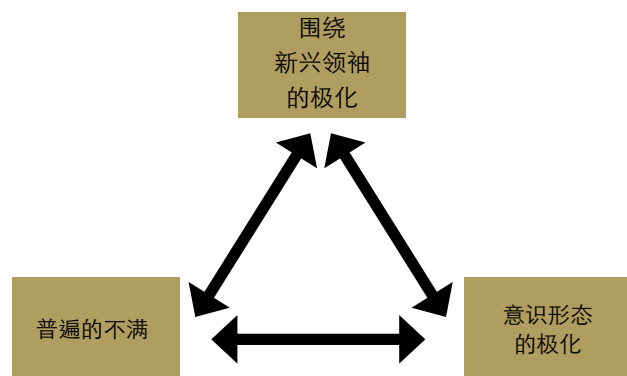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提出两个问题。冲突在不同国家中是如何被组织的？对区域的民主而言，这些冲突的结果和挑战是什么？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以及其它相关问题，由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资助的 [POLDER](#) 计画（全称为：拉丁美洲的极化、民主与权利计画），在 2021 至 2023 年间运用了混合性的方法，对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等五个国家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

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认为，随着大宗商品繁荣的结束，拉丁美洲的社会冲突能归纳为

>>

三种类型的情境：带有情感因素的意识形态极化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with affective components)、围绕新兴领袖的极化 (polarization around an emerging leader)，以及普遍的不满 (generalized discontent)。如图一所示，这三种类型是动态的并且不遵循预先设置的顺序。

当代拉丁美洲的不满情境



图一

> 三个案例分析：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

在 POLDER 计划所研究的国家中，阿根廷与巴西，和乌拉圭一样都属于意识形态极化的案例。在哥伦比亚则有着普遍的不满，这和秘鲁与厄瓜多尔是类似情况，虽然有着细微差异。而属于围绕领袖极化之案例的，有在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执政下的墨西哥，以及 Nayib Bukele 所领导的萨尔瓦多。我们会以这三个案例来阐明上述所说的三种类型的情境。

在巴西，极化伴随着一次「左翼转向」而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该次「左转」是围绕着一个由工党（葡萄牙语缩写为PT）、公会以及社会运动所组成的稳固的社会-政治联盟而建立的。如 [Singer](#) 所主张，工党政府在指定再分配政策的同时也推行了进步文化、性别与人权等政策。[Samuel 和 Zucco](#) 则指出，当 Bolsonaro 出现在竞选场合，他代表的是那些分散和异质的选民，这些选民之所以聚集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他们拒绝工党（如 [Santos 和 Tanscheit](#) 所指出），再来是因为与没有充分表现出对 Lula 及其政党的文化与经济不满的主流右翼意见不合（如 [Rennó](#) 所指出）。

而在哥伦比亚，根据 [Botero, Losada 和 Wills-Otero](#) 的论证，即便身为自由党的领袖，Álvaro Uribe 仍成为了传统政党候选人的威权替代选项而于2002年崛起。在「民主安全」(democratic security) 的框架内，Álvaro Uribe 对国内武装冲突的强硬政策成功地塑造了政党品牌。2016年的和平协议公投呈现出高度的选举极化，并且反对协议者和宗教保守派之间形成的策略性联盟。然而，投票的非党派性质有碍于社会-政治联盟的巩固，这些联盟可能会为选民制定不同的议程。在2018年，全国层级的左翼候选成功进入了第二轮的总统选举。而在2022年，这股势力成功致使其领导人 Gustavo Petro 掌权。

在制度革命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长达七十年的统治以后，墨西哥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经历了民主开放的进程。由三股竞选势力共同形成的竞争系统出现了：首先是制度革命党，作为一个大众型政党，凭借其模糊的意识形态组成维持了自身的影响力；再来是作为保守政党的国家行动党 (Partido Acción Nacional)；最后是民主革命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mocrático)，一个中左翼政党。在 2006 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革命党被一股带有鲜明的重建性基调的新运动所吸收：国家再生运动 (Movimiento de Regeneración Nacional) 吸收了民主革命党大部分领导层及基层成员。国家再生运动的领袖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即所谓 AMLO)，以反对政治建制及其「特权」的言论在 2018 年成为了总统。同一政党的 Claudia Sheinbaum，在 2024 以高票当选。

> 国家情境于社会层面的不满

不同的国家情境如何影响社会不满的形塑？在我们的论述中，与 [Ken Robert](#) 关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情境的讨论一致，我们认为是代议者 (agents of representation) 提供了社会组织不满情绪的框架。以巴西的案例来说，如 [Kessler、Miskolci 以及 Vommaro](#) 所指出，工党选民在文化及经济问题上持进步立场。而 Bolsonaro 的选民在这两方面都相对保守。在针对政治菁英普遍不满的情境中，政党虽然组织了政治局势，但作为代议者却相对薄弱，因此无法在社会层面上组织冲突。哥伦比亚就是这种情况，如 [Kessler 等人表明](#)，选举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相互关联较弱。而当极化情境围绕领导人而展开时，这种两极分化则主要发生在选举层面，但不会在社会主要议程中组织偏好与诉求。与哥伦比亚的情况一样，墨西哥的选举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相互关联较弱。

我们所定义的三种情境也对组织冲突的不同面向有所影响。第一个明显的影响是对社会层面的议程的政治化 (politicization)。高度极化与对政治更强的关注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民意明显与投票选择保持一致。这些观念与社会-政治联盟提供的框架相关。巴西有更多关于权利的论述和语言，而基于个人标准的论点则较少。而在墨西哥和巴西，有更高的政治关怀以及政治资讯的获取。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是政治最轻微的案例，这是因为其更多地侧重宗教框架，同时对政治资讯的获取较少。

第二，存在着不满情绪的意识形态对齐 (ideological alignment) 的影响。高度的对齐意味着，在议程上组织立场的框架遵循着左右分野（及其国家特殊性），后者一般与主要竞争的社会-政治联盟有所关联。在具有意识形态极化的巴西，能够轻易分辨出不同竞争选项的选民之间意识形态的边界。在哥伦比亚则流行着普遍的不满情绪。机会的缺乏以及对菁英的负面看法引发了对竞争环境不公的认知：仿佛一切都已经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菁英所摆布。而对竞争环境不公的观念进一步引发了冷漠与愤怒。在墨西哥，关键的因素在道德方面，以及对墨西哥近代历史中主导人物的质疑，特别是在腐败和特权的问题上。

>>

情感极化的程度和内容在三种情境下也有所不同。巴西表现出以意识形态极化的方式对竞争对手最高度的道德否定。据此，情感的极化反馈到意识形态对齐而不是加以取代。能够从哥伦比亚观察到明确的对比，那里只有在小而强硬的选民群体中才会出现对对手的负面看法。与此同时在墨西哥，意识形态对齐也是分散的。尽管如此，AMLO 的形象可能会促使社会进行意识形态重组，也可能仅仅成为一次难以持久的民粹动员（populist interpellation）的经验。

> 情境的概念化和极化的处境

透过我们对情境的概念化而呈现的动态特质，对极化处境具有影响力。众所周知，极化对民主活力有不均衡的影响。它组织了不满情绪，造成了高度的政治化，但它也在社会层面上引发了大量的敌意。

围绕新兴领袖的极化情境可能为威权导向提供成长的空间。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墨西哥，Claudia Sheinbaum的总统任期似乎预示着民主的深化。然而，其它新兴领袖承诺将长期积累的不满转化为变革的希望，可能成为是偏执民主（illiberal democracies）的警讯，正如塞尔瓦多的 Bukele 所体现的；也可能如阿根廷的 Milei 那样，转向了没有确定未来的极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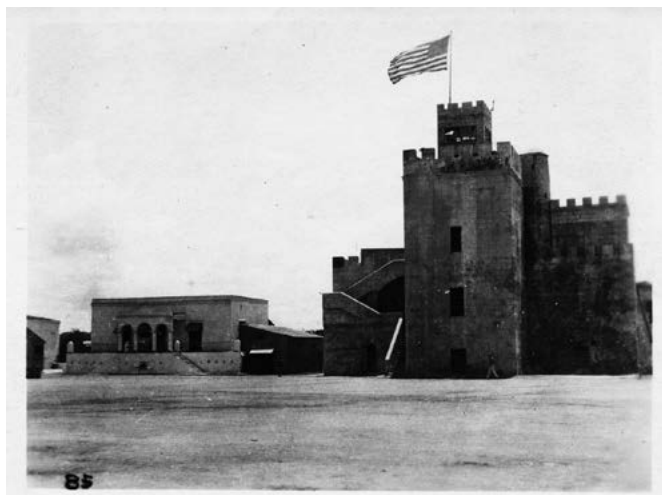
最终，普遍不满的案例似乎在拉丁美洲最为常见。对民主的不满、低投票率，以及社会将不满转化为变革行动的困难，都指向一个没有明确变革视野的政治高度波动的情境。■

来信寄至：
Gabriel Kessler <gabokessler@gmail.com>

* 本篇文章的前一个版本发表在《民主评鑑》。

> 海地：国家的暮色

Jean-Marie Théodat，PRODI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法国



出处：USMC，1922，Richard，来自美国，Openverse

一般来说，恐惧是威权政府用来压迫人民、巩固舆论的工具。然而在今日的海地，恐惧却不是用来巩固权力的工具，反倒是权力缺失的后果。因为正当性暴力垄断的丧失，导致确保公民安全的统治权力，分散到了贪婪的个人手中。与此同时，长期遭受社会与文化排斥、财富分配不均的那些在社会上受压迫的群体们，面临着失落感。而这种强烈的失落感催生了反社会的暴力运动，也就是帮派。帮派的火力强大，连国家都难以击败他们。

> 暗杀、有罪不罚和恐惧

2021年7月7日，总统 Jovenel Moïse 当着妻子和孩子的面被暗杀。根据目击者的说法，受害者在被自动武器击毙前曾遭受极大的折磨；因为，他身中十二颗子弹而亡。这听起来过于疯狂，几乎像是一部B级片电影的剧情。而更骇人听闻的是，凶手竟然能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地轻松逃脱暴力现场。直到凶手回到基地时，他们才会被逮捕。显然地，他们对于自己能逍遥法外的状态感到非常自信，甚至没有藏匿任何他们的武器。所以说，这些凶手究竟是如何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进入总统官邸的呢？这个问题与他们犯罪动机，同等重要。这些刺客竟可以在没有引起国家元首保镖的注目和警觉下，进出总统官邸。这次刺杀，是黑手党式的行动，也是对目击者的警告，要求他们保持低调。

> 备受质疑的选举、冲突的持续以及治安的溃败

在总统 Moïse 遇刺时，他并非一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Moïse 于 2016 年当选，上任前的选举过程有许多违规之处，临时选举委员会（Provisional Electoral Council，CEP）还因此迫使连续两次重回计票绘图板。临时选举委员会被指控贪污，以及大规模挪用 Petrocaribe 计划下的公共资金。他们被指控长期影响政府决策，并被视为总统的替身。2010 年 1 月 12 日的地震造成了海地超过 90 亿美元的物资损失，超过 25 万人死亡或失踪。

示威活动一般来说是从首都的较为贫困社区开始，接着扩展到有钱的人居住的 Pétiion-Ville 富庶区域。虽然一开始是和平的，但抗议活动经常演变成洗劫商店、抢劫仓库，以及针对街头店家的破坏行为。

2016年至2018年间，示威者与警察在太子港（Port-au-Prince）爆发了强烈的冲突，双方交火的过程导致许多匿名受害者的死亡。与此同时，谋杀反对者并不会使得犯罪者被捕，或甚至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因为这位国家元首本身，他也是以强硬的手段剷除对手的支持者，而他最终也会死在他用来镇压街头示威者的剑下。事实上，像这样完全依赖外部渗透者来服务、不服从民主的授权来维持公共秩序的权力，注定会消失。使用民兵和犯罪帮派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反映出政府逐渐走向黑手党式的治理方式；而同时也使得毒品走私集团逐渐在国家权威的行动中，成为了领导国家秩序的角色。

> 暴动、帮派和随选谋杀

为了确保政府人员、全国各地重要的路线和入境点（港口、机场和边境口岸）的安全，使用私人服务供应商成为武器交易商的特洛伊木马。自 1995 年海地军队解散后，使得武器交易商更容易进驻。2018 年 3 月，La Saline 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这是首都最贫困的社区之一，也是许多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起点。当时，多达 80 多名民众被帮派老大 Jimmy Chérizier 的追随者杀害。有些人被屠宰，甚至被烧烤。回想起来，Chérizier 的母亲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贩卖烤香肠时，人们就给他取了个「烤肉（Barbecue）」的绰号。而到目前为止，政府尚未逮捕到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公开调查，受害者的亲属则因害怕被报复，而始终保持沉默。

2018 年 7 月，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政府面临暴乱和路障重重的街头。尽管国家的声誉扫地，首都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锁长达一周之久，但政府还是勉强保住了权力，而其代价是帮派策划好的血腥镇压。在贫困的社区里，恐怖的场面屡见不鲜。民众发现自己成为了任武装帮派摆布的存在；帮派们谋杀、强奸、纵火焚烧居民，然而警方却丝毫没有任何干预的动作。2018 至 2021 年间，反对政府的人被有系统地谋杀，而犯罪者却不用承受任何后果。Monferrier Dorval 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被暗杀，Antoinette Duclair 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被暗杀。前者是一名律师，也是太子港律师协会的主席，一名宪法专家；他曾对总统提出的公投修宪提案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后者则是一名批判政府的记者。这两人详细被暗杀的状况，至今仍不清楚，但种种证据都显示了，似乎是皇室下令去暗杀他们的。

Jovenel Moïse 总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遇刺身亡的。Ariel Henry 担任总理，执掌大权时，他的权力受到前任总理支持者的挑战；而前任总理在谋杀案发生的前两天，才刚被解职。从 2021 年 7 月到 2024 年 2 月，Henry 才下台；他的政府无助地看着 80% 的太子港都会区，被名为「Viv Ansanm」的犯罪联盟武装帮派接管。Viv Ansanm 的火力强大，他们总计有超过 600,000 件的作战武器。Jimmy Chérizier 用铁腕统治这个黑道集团，他在 2024 年 1 月对中央政府发动了第一次攻击。而为了替自己的这个行动辩驳，Chérizier 声称自己是替受压迫的民众向政府发声，他是他们的捍卫者。然而，Chérizier 在采用这种虚假的革命的言论的同时，他也在在首都最贫穷的这些社区（Bel Air、Delmas、Grand Ravine 等等）不断地肆虐压榨当地居民。

> 军阀和总统转型委员会的崛起

面对无能且腐败的政府专制，部分反对派选择在 2024 年 2 月要求总理辞职。当警方已经使用最大的力量来干预，但还是无法吓阻示威者时，私人民兵就会被调来协助维持秩序。政府利用民兵作为辅助队伍，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遵守任何规则，更不遵守任何荣誉准则。民兵在贫困社区大肆屠杀，并将已经够绝望的居民赶出他们想要控制的区域。昔日的帮派领袖，现在成了军阀，并在城市的外围制定自己的法律。Izo、Lanmò Sanjou、Tilapli、Chen Mechan 和 Barbecue，这些人的名字和政府官员的名字对大家来说，已经一样耳熟能详。与此同时，政府逐渐失去原本应该是协助他们建立工作的帮派的控制。

帮派的所作所为强力冲击了政府权力的象征，让人担心他们是否可能接管国家皇室。国家动盪不安，像是武装匪徒阻止总理出国旅游后返回海地，然后总理被迫辞职。总理的失败，除了提供一个清除无能者的机会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国家权威体系的崩溃。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帮派份子现在在公开声明中，要求直接地参与 2024 年 4 月 30 日成立的总统转型委员会。Chérizier 那虚伪的革命言论确实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共鸣，而这些年轻人也因为政治权力倾向犯罪暴力的状态，而迷失了方向。

> 漂泊无依的国家

幻想破灭的程度、不平等的规模，以及找到解决极端贫富差距问题的难度是相同的。在海地，约 20% 的人口拥有了国家 65% 的财富；然而，最贫穷的 20% 人口只分到 1% 的财富。革命的时刻，彷彿已经到来；但大多数人却拒绝加入革命运动，只留下了少数的狂热份子，用言语与火焰表达他们对不平等且玩世不恭制度的厌恶。而来自郊区的劳动阶级，因为太专注于日常的生存，没有时间参加示威。至于中产阶级，由于流亡（85% 拥有硕士或更高学历的人都住在国外）而一无所有，因此他们也没有参加抗争，因为他们害怕那些被激怒的暴民会施以暴力。

寡头政治在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事实上是处于系统性的不稳定地位；而金字塔的底部则严重膨胀，为了继续生存，寡头政治与黑社会的界线逐渐模糊。许多商人和政客（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参与各种贩卖活动。无论是在与多米尼加的陆地边界、与牙买加的海上边界，还是与加勒比海大陆各国（佛罗里达、哥伦比亚、巴拿马）的空中边界；海地都处于一个与非法武器和毒品经济有关的网路中心。这个网路最终在海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紮根，甚至渗透到公共场所。

> 往返不息，却滞留在外

Jean-Bertrand Aristide 总统在 1994 年结束流亡回到国内时，解散了海地的武装部队。在暴力事件增加的十年后，由于联合国特派团的存在，海地在 2004 年至 2017 年间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有超过 10,000 名士兵和警察，为平息首都最动盪的地区做出了贡献，但代价往往是非常血腥的。特别是巴西军警所进行的「平息」，在记忆和墙上都留下了印记。国家警察在 2018 年只能指望 10,000 名现役警员。而据说由于美国政府暂时提供的免签证移民美国的便利，所以吸引了人员叛逃，目前当地只剩 7000 人。

太子港都会区据说有几百个帮派。2024 年 2 月，他们联合起来，打着 Viv Ansanm 的旗号，由 Jimmy Chérizier（又名 Barbecue）领导，正如我刚才所说，冲击了权力的所在地。他们袭击了国家监狱，释放了几千名囚犯，其中包括长期服刑的罪犯；之后，他们继续攻击学校、警察局、教堂、图书馆和庙宇。他们真的在宫殿的台阶上停了下来，因为首都的权力中心 Champ de Mars 成为了战场，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实际的情况上。

而「外围国家」（首都以外的其他省份）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帮派暴力的影响。与首都不同的是，在外省，邻里间的警觉性仍然是种障碍，也就是某些反社会倾向表现，由于社区团结仍然能对抗入侵者，因此犯罪也在此找到了敌对的温床。

棚屋区已成为无处可依的地区，勒索、偷窃和强奸成为常规。城市人口外流已将这些社区的居民清空，迫使他们到外省寻求庇护。

而较富裕的社区并未受到影响，但上层阶级的人们仍保持警戒：因为，他们是挟持人质者的目标，他们有可能在主要道路上埋伏捕人。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向海地提供援助，因为他们害怕被卷入正在席卷全国的暴力漩涡中。受到最直接威胁的多米尼加人，正在仅仅超过 370 公里长的边界上建造长达 160 公里的围墙。而由于美国自 1962 年起对古巴实施禁运，古巴人被排除在外。美国——那唯一有能力对此情况产生改变和影响的国家——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从佛罗里达运往古巴的武器贩卖。正如我刚才所说，据报道有超过 60 万件作战武器在海地流通。美国反而选择要求肯亚领导和平使命，而联合国因为缺乏安全理事会的共识，已无法再接手。

面对全球化的犯罪，海地站在民主化的最前线。这个国家只能独力应付类似黑手党的网路和犯罪组织，这些组织在佛罗里达、南美洲和伊斯帕尼奥拉岛都有强大的据点。他们也有能力动员国家所缺乏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 幻灭的孤独

在 Jovenel Moïse 任期结束时所发生的零星动乱，其背后反映的是深陷结构性痛苦的人民，他们的愤怒与痛苦。海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年 40 亿美元的海外移民汇款满足了最基本的粮食需求，但他们却无法生产足够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官方发展援助也不行。而官方发展援助却佔了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他们国家的生存有赖于移民汇款，以及友好国家预算援助的双重挹注，但在国际捐赠者有其他优先项目需要推动时，他们国家的命运看似又离走向光明远了一步。2010 到 2020 年间，通胀的增加，最贫困人口购买力因而受到了影响，这些最脆弱的族群因而流落街头。来自 Cité Soleil、Canaan、Pernier 和 Carrefour 等贫困社区的年轻人，既没有接受教育，也看不到未来的前景，他们因此成为激进政客和帮派的牺牲品。前者利用他们在暴力的示威活动中作为人肉盾牌，后者则招募他们进行残忍的暴力行为。

在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中，被边缘化的人在领土层面上赢得了斗争。这些暴徒已经控制了首都最贫穷的社区，他们扩大了对市中心和通往外省的交通要道的控制，复盖了太子港都会区 85% 以上的土地。国家的崩溃，就源于这犯罪集团的管制。到了极端时期，黑帮在社会网路上实行和上演的恐怖主义，已严重导致海地法律制度的溃败。■

来信寄至：
Jean-Marie Théodat
<Jean-Marie.Theodat@univ-paris1.fr>

> 绘制冲突： 形构美洲「绿色」开采的相关争议

Mariana Walter, Institut Barcelona d'Estudis Internacionals (IBEI), 西班牙和 Global Atla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EJAtlas)

Yannick Deniau, Geocomunes, 墨西哥

Viviana Herrera Vargas, Mining Watch Canada, 加拿大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期刊](#)中，我们纪录并研究了一张专案地图绘制的过程。地图由「全球环境正义地图集」（EJAtlas）、加拿大采矿观察（Mining Watch Canada）、受影响的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的研究人员共同制作，旨在记录被认为对绿色增长以及相关的能源和数位转型至关重要的金属与矿物的开采如何扩张，并造成影响与所进行的抵抗行动。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探讨了形塑「绿色」开采前线扩张政治的各种机制与论述，并分析这些过程如何对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在地化」或「回流」）动态带来紧张局势。

我们记录了25起与锂、铜及石墨开采相关的大规模采矿冲突，涵盖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墨西哥、美国 and 加拿大等九个美洲国家。超过30个组织和十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共同协作。参与者携带不同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共同制作案例故事，并在「全球环境正义地图集」中开发了一张主题地图。



> 一场开采转型

世界银行于2020 年评估在接下来的 30 年内，全球能源转型将需要开采 30 亿吨矿物与金属，以避免全球气温上升超过2° C。目前，对铜、石墨、镍、锌、铬、锰、锂、钴及稀土等金属与矿物的需求正急剧增加，以支撑电网、电动车、太阳能与风能、电池等技术及基础设施的发展。主导性的能源与数位转型情境展现出对前所未有的大量多样金属与矿物开采的迫切需求。

各国政府与私部门为确保各类金属与矿物及其供应链的紧迫行动，正在加速开采前线的不断扩张，进一步加剧矿产资源开采压力，并在全球南方引发更多抵抗，同时也在工业化经济体内激化采矿冲突。美洲地区的开采紧张局势尤为显着，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记录，该地区拥有全球已知铜、锂、稀土、镍和石墨储量的重要份额。这两大洲已经开采了全球大量的铜与锂等关键材料。数十年来，拉丁美洲一直是全球三分之一矿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 去碳化共识

主流的全球能源转型路径正推动去碳化与能源安全的发展，并引发这场新的全球商品热潮。Breno Bringel 和 Maristella Svampa 提出了「[去碳化共识](#)」的概念，以描述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形成的协议，即从化石燃料转向以低碳技术为基础的低碳经济。他们认为，这一共识的论述基于这样的观点：为了应对全球暖化与气候危机，必须透过生产与消费的电气化，以及数位化来推动转型。然而，这一共识不仅未能真正解决气候与社会生态危机，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扩大了社

资料来源：由 Y. Deniau 准备

备注：该图显示记录的25个案例和所涉及的商品。灰点代表EJAtlas中绘制的过渡金属和矿物相关的其他阻力运动，这些运动不属于本次绘图工作的一部分。



出处：Matheus Ribbs，@o.ribs，2021

会生态不平等，加剧对公共资源的剥削，并持续将自然商品化。事实上，正如多位行动者与学者（如 Lang、Hamouchène、Sandwell、Bringel 和 Svampa）所指出的，这一过程正在加剧能源殖民主义，并在全球南方开启新一轮的环境掠夺。

「绿色开采主义」（green extractivism）这一概念的提出，描绘了一个矛盾现象，即是具有殖民历史且对环境具破坏性的开采与累积模式，却被宣传为解决生态与气候危机的方案（参见 Voskoboynik 和 Andreucci，或 Zografos 和 Robins）。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与能源与数位转型相关的开采活动，正对全球原住民族及其领土、生物多样性与森林砍伐风险，以及人权造成严重影响。

> 地缘政治变迁与（去）全球化

考虑到当前「绿色」开采边界的扩展——以供应「绿色」增长议程及其转型——可以看到相互关联的过程正在交汇。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引发对于确保关键材料和能源供应链控制的需求的增加。此外，新冠疫情还导致全球，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的严重衰退和公共债务，并强化了开采主

义政策。事实上，社会组织已经揭露，新冠疫情被政府和企业利用来推动开采活动，将邻近社区的健康置于风险之中，并加速批准争议计划，这些计划未经充分的地方参与或协商，也未能有效地进行公共抗争。

欧盟、加拿大和美国对于关键材料和供应链的依赖性与脆弱性进行的不同评估，指出了对金属和矿物需求前所未有增加的挑战，以及争夺相同资源池的全球竞争。这些评估还显示出对第三国（尤其是中国）在获取某些材料方面的高度依赖。各国正在推动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策略，以确保关键材料的供应链。此外，政府和国际机构强调，矿场的开发速度无法跟上对关键材料预测需求的前所未有增长；因此，推动了快速审核和许可流程的倡议。

为了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安全，各国正在制定一系列国际投资工具。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正大规模投资于关键金属和矿物的开采，这些投资也涵盖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欧盟的国际工具包括涉及原材料的战略伙伴关系、包含特殊能源和原材料章节条文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全球网路（Global Gateway）。目前，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家正在进行协定相关的制定。

目前，各国正竞争控制各种矿产资源，以应对脆弱的供应链、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能源和经济安全的展望，也包括军事目标。这场竞争导致了保护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的加剧。此外，为了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对开采（和加工）活动的需求加速，无论是在旧有还是新开发的场地，无论是在工业化经济体内外，矿业在曾经取代这些活动的国家得到重启。然而，相关的影响和反抗正加剧对全球化（例如，供应链中断和争议的增加）和去全球化（境内转包）动态的紧张局势，从而突显出当前增长和消费趋势的限制，以及新一阶段全球化可能面临的限制。

> 绘制「绿色」开采边界扩展的话语与机制

我们在此关注的绘制过程，记录了一些正在塑造「绿色」开采边界扩展的机制。在所考虑的案例中，政府、发展机构和企业将关键材料开采计划视为积极且紧迫的地方性、国家性（发展、绿色转型或安全）以及全球性（气候与人类拯救、减缓或可持续性）目标。这些话语也将成为针对矿业中自私、不负责任或无知的抵抗框架。

然而，反向话语也在对抗并颠覆主流话语，挑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环境不公。社会环境运动和原住民社群声称，他们的领土正被转变为牺牲的体系，使得社群当中的社会与健康变得更加脆弱，并对敏感且未充分了解的生态系统、水源和文化遗产地造成影响。尽管在全球南方，对当地抗争者的犯罪化和暴力行为屡见不鲜，但在美洲各地，对不当和不良决策及参与程序的指控也随处可见。在加拿大和美国，许可核发流程的加速引发了地方的不安。

尽管这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但在专案中所绘制的25个矿业冲突，有20个影响了当地的原住民社群。这包括加拿大和美国所记录的六个案例中的四个，这些大多是新计划。当地原住民谴责正在塑造「绿色」开采边界扩展的殖民主义模式，这些模式牺牲了人民和领土，并将人类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置于风险之中，而非拯救它。

许多记录的案例显示，开采边界的扩展和社会生态紧张局势在美洲各地加剧。许多已经承受长期且剧烈社会环境压力的土地，正遭受影响和经历冲突的加剧，进一步加深了分配不公的负担。在阿根廷的Andalgalá，地方组织Algarrobo Assembly反对开发Agua Rica和La Alumbreira (MARA) 铜和钼矿的开采计划。地方社群主要担心水源以及冰川和冰川边缘环境的影响。这些担忧源于对Alumbreira矿场的过去的负面经验，因该矿场运营了二十年，造成环境退化、水源污染和农地减少。Alumbreira计划引进处理来自35公里外的

Agua Rica资源。然而，该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并且多次宣布水源、环境和农业紧急情况。Algarrobo Assembly谴责该公司每天将消耗三亿公升水：是当地12,600名居民用水量的六倍多。这个已经持续二十年的抵抗运动正面临着暴力和犯罪化的情况。在加拿大，反对北美锂（NAL）计划的社群引用官方证据，指出现有影响和不充分的水文地质研究。在秘鲁的Chumbivilcas，原住民社群报告称，La Constancia铜矿对环境和水源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样，在智利，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团体谴责La Escondida矿场，称其对Punta Negra盐滩地下水层造成了持续、永久、累积且不可回复的损害。

反对锂开采的地方团体认为，环境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充分考虑各种矿业计划的累积影响。在阿根廷，尤昌基金会（Fundación Yuchan）制作了一张地图，图中显示位于Hombre Muerto盐滩的多个锂卤水计划。这张地图旨在将焦点从单一计划转向土地本身，突显对水系统的综合压力——他们声称这一方面在正式评估中被忽略。这一更广泛的视角至关重要，更促使2024年3月法院裁定暂停新的锂矿开采许可证。当地社群指出，尽管有证据显示水源的可用性持续受到影响，例如河流和生态系统干涸、动物迁移或死亡以及生计中断，但新的锂矿开采许可证仍持续被颁发。

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共同协作的专案地图，此一专案旨在将分析重心从尺度视角转移，检视开采边界在地方和洲际层级的扩展，以及地方与综合性的影响、意义和背后随之而来的抵抗。

> 最后提点

生态退化已引起广泛关注，但对于「绿色」开采扩展的地方草根社会抵抗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专家指出，随着我们逐步接近关键矿物和金属的短缺情况，环境、社会与治理因素可能成为未来几十年金属和矿物供应链的主要风险，超过直接的储备枯竭。事实上，尽管当地社区和社会环境组织全球范围内反对开采边界的扩展，政府和金融机构日益担心社会环境影响及对矿业的反抗对绿色增长与转型议程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冲突迫使全球矿业资源开采延迟或停止开采计划，导致显著的成本增加，包括由于延迟而造成的生产力损失，这些损失可能从数千到数百万美元不等。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迫使多个国家取消矿业计划，包括西班牙、塞尔维亚、巴拿马和阿根廷。同时，政治风险也非常高：在2023年，葡萄牙锂矿开发中的贪污指控导致总理辞职。

此外，尽管本文主要集中于矿业开采，但整个供应链中也出现了紧张局势，包括加工、运输、处置/回收以及低碳能源的生成（如太阳能和风能）及基础设施。在绿色增长情境下，前所未有的材料开采和消费压力正将「绿色」开采边界（及供应链）推向未知领域。这包括开采的规模和加速的扩大、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探索新边界的活动，例如深海或太空，无论是在全球南方还是工业化经济体内。如我们所见，这一过程加剧了生态危机并激发了抵抗，限制了某些地区的扩展，并塑造了「绿色」开采扩展的政治。这种抵抗正在加剧全球化和境内转包的紧张，突显出不仅是增长和消费的限制，还有对新阶段全球化潜在约束的挑战。■

来信寄至：

Mariana Walter

<marianawalter2002@gmail.com>

*完整版本曾于2024年12月26日刊登于[Critical Sociology](#).

>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简要图解

Miguel Serna,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乌拉圭

近几十年来，社会学作为一个专业在各个领域和社会角色的毕业生数量与品质上都有所扩展。然而，面对经济危机的反复发生或持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已经撕裂了社会结构，加上新的社会行动者的崛起，催生了对社会学研究的新需求。本文透过对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的比较分析，探讨社会学从学术领域到专业领域的发展、其特征与演变。

> 动盪的开端

拉丁美洲社会学机构化的过程是困难的，并且充满了各种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对推动社会学研究持保留态度的意见、对学术自主性的需求、对公共承诺的要求，以及对学术生活国际化的关注。

然而，学术发展的倡议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的道路，经历了各种制度性障碍、多种不同的步骤、进展与挫折。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在以培养传统自由专业为主的学校体系中进行实践。巴西则展现了不同的轨迹，其大学发展较晚，但受到北美模式的影响加速发展，设立了哲学与人文科学学院以及研究发展部门。在整个美洲大陆，社会学家们发展了一种学术实践，其目标并不仅仅是教授和培养专业人才，而是根据科学方法的标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实践。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拉丁美洲改革传统的大学模式密切相关，这一模式的特征是政治承诺和捍卫大学自主性，尤其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因此，社会科学的历史遗产及其背景将严谨的社会研究与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抗争传统结合起来，特别是在面对持续存在的威权政治体制和干预时，这些问题困扰着该地区。自最近的民主化过程以来，社会学的学

术制度化与专业化过程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内外社会需求时，正在重塑其遗产和实践。

> 一个深根本土正经历高速国际化的专业

社会学社群的形成是沿着双重轴线进行的：一方面是社会学知识的本土根植，另一方面则是与拉丁美洲及国际学术空间的对话。社会学早期进入国际化的过程，明显地表现在1950年同时加入国际社会学学会（ISA）和拉丁美洲社会学学会（ALAS）。此后，分别于1969年成立了拉丁美洲农业社会学协会和1993年成立了拉丁美洲劳工研究协会；此外，具有次区域性特征的中美洲社会学学会则于1974年成立。同时，社会学的国际化始终与其他社会科学保持着持续的对话，这一点表现在积极参与区域性网路，如194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1957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FLACSO）和1967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委员会（CLACSO）。

有许多指标显示出社会学学术社群的逐步形成（研究中心、大学、专业课程、专门出版物等）。然而，同时这一过程的实现和强化也得益于一群行动者、教授、知识分子和社会学专业人士，他们任职于不同领域、建立网路和协会，并举行公共集会，将自己类别和专业群体的知能贡献社会。

另外，庆祝社会学家的官方纪念日也体现了拉丁美洲社会学专业社群的集体归属感。在智利，这一天是11月24日，纪念1982年智利社会学学会的创立。在哥伦比亚，12月10日纪念该国于1882年设立的首个社会学讲座。在巴拿马，庆祝的日期是12月12日，以纪念社会学家和作家Raúl Leis Romero，而

在秘鲁，则是12月9日，纪念1896年在圣马科斯国立大学设立的首个社会学讲座。最后，在委内瑞拉，2月11日纪念首个社会学与人类学会的创立。

> 社会学协会：主要目标与发展

为了呈现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协会的大致概况，本文根据以下标准对进行分类：a) 行动的主要目标，分为学术或专业领域，b) 成立时间和延续性，c) 地区范围。

在针对协会性质（学术或专业）与时间变数（成立时间和延续性）进行综合分析后，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实证观察。从长期来看，协会的发展显示出执行层面的缓慢且不均衡，尽管协会的数量和拥有协会的国家数量逐步增长。

另外，比较性的纵向分析使我们能够确立三个具有特定特征的历史时期，与前述分析相符。拉丁美洲社会学的草创时期介于193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社会学协会从学术领域的发展、网路和在国家与区域层面的表现。随后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协会扩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协会的专业性特征更加突出，社会学专业的实践逐渐从学术领域转向大学外的领域。这一时期伴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和非学术领域的专业实践。最后，我们可以识别出跨越21世纪头二十年的一个时期，其特征是社会学家培训的多样化和制度化的巩固（大学部与专业研究所课程），以及机构和协会在地区层面的深耕。这一时期见证了许多国家学术与专业协会的逐步且并行的增长。

> 网路、国际团结与学院及专业协会的兴起

各种协会促进了多种形式的集体团结与网路的发展，这为专业类别提供了多样性的归属感和内部认同，例如透过建立团体成员身份或在社会学活动和大会上组织社交聚会等。此外，还有动员、倡议和对社会事业的公开承诺，以及捍卫弱势社会群体的行动，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网路中这些实践都指向了国际团结。

具有专业或行会性质的学院和协会的兴起，旨在捍卫、促进和强化社会学专业领域，这一发展较为近期。这些协会与社会学知识及其专业的公共合法化，以及专业实践中的法律和规范进展密切相关。这些规范是异质且不完整的，从大多数国家缺乏专门的职业立法，到在多个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和乌拉圭）存在严格规范的专业学会，规范范围从国家层级到次国家层级不等。

> 当前的风险与挑战

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协会的形成以及这一专业的实践，绝非线性演进或进步的结果，而是面临了多重障碍与挑战。一方面，拉丁美洲的保守派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抱持着怀疑态度，并将社会学家视为社会秩序的威胁。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需求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的需求可能带来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削弱社会学专业实践中的某些关键层面。

此外，专业领域的变革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包括颁发大学学位和证书数量的增加与相对贬值，以及专业劳动市场的弹性和不稳定的过程。此外，远端工作的兴起，对照顾分工和性别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为明显。由于认知到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日益需求，还存在将批判性特质和分析反思替代为过度重视软技能和市场数据技术管理的风险。

对社会学专业的挑战在于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知识动态需求，同时不失去其批判性与社会承诺。这意味着要承袭拉丁美洲社会学的历史遗产，包括对社会秩序深刻变革的承诺，以及反权威抵抗的文化。在这一时代变迁中，社会学需要扮演批判权力结构的知识分子角色，并公开谴责贯彻整个区域的社会不平等。此外，还需要恢复社会学的批判视角，将被边缘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行动者凸显出来，揭示促使权力机构与不平等得以延续的社会机制，并透过批判性反思质疑常规的简化与自然化，对公共议题中反复出现的社会问题（如暴力及其运用）进行深入探讨。

领域	年度	国内所属组织	区域协会
学术领域	1930-59	Brazilian Society of Sociology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Latin Americ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学术领域	1960-79	Colombi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Centr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ural Sociology
专业领域	1980-89	Council of Professionals in Sociology (City of Buenos Aires)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San Juan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Chile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Peru	
专业领域	1990-99	Panamani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National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College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Panama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Uruguay	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bor Studies
学术及专业领域	2000-09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of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of the Province of Mendoza Network of Sociology of Chilean Universities	
学术及专业领域	2010-09	Argentin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Santiago del Estero Union of Sociologists of the State of Sao Paulo Union of Sociologists of the State of Rio de Janeiro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ologists Colombi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refoundatio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s in Sociology of Costa Rica Salvador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and Social Science Professionals Hondur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Paraguay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of Paria (Venezuela)	

表一

注：有些国家没有国家层级的社会学学术协会，但拥有在国际学术界认可且长期存在的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中心机构（研究所、系、学院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墨西哥。有些国家则同时拥有国家层级的协会和大学的研究中心，如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乌拉圭。

简言之，社会学必须依赖「社会学想像力」作为一项基本的专业资源。超越过往的遗产、制约与挑战，社会学协会与其专业技能或许正是社会学在社会变迁中的最大优势。■

来信寄至：
Miguel Serna
<miguel.serna@cienciasociales.edu.uy>

*对于数据来源的审查，我要感谢来自ALAS社会学协会和专业协会网路的同仁，特别是Eduardo Arroyo（秘鲁）、Ana Silvia Monzón（瓜地马拉）、Flavia Lessa de Barros（巴西）、Alejandro Terriles（阿根廷）、Raúl González Salazar（委内瑞拉）、Briseida Barrantes Serrano（巴拿马）、Carmen Camacho Rodríguez（哥斯达黎加），以及Mónica Vargas（智利）。

> 在危机和不确定时代中的拉丁美洲与哥伦比亚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 (Lat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简称 ALAS)



出处：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 (ALAS)

自1950年来，批判性社会思想一直支撑着ALAS作为一种关切其时代的知识运动，在我们的大会上获得了认可。多米尼加大会是两年筹备工作的成果，这些持续的努力旨在赋予社会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以历史性和文明的意义。我们的非裔阿比亚亚拉美洲 (Afro-Abya Yala America) 既是加勒比的也是拉丁美洲的；我们的跨文化联系不仅滋养了性别、族群、区域与国家的多样性，也不断更新我们自主整合的挑战——这种整合带有对权力的殖民性 (coloniality) 的批判、同时具有解放性并向替代性的共存模式开放，后者拒绝一切形式的排斥、不平等与歧视。

作为横跨所有地缘政治尺度的一个全球性、系统性以及多重层面的现象，多重危机 (polycrisis) 是一个基

于西方规则的世界秩序危机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着新的多极主义 (multipolarism) 的紧急状况，其中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可以在积极不结盟 (Active Non-Alignment) 以及争取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南-南关系。

这一背景加重了社会不平等以及残酷的收入集中，并加速了前所未有的贫穷化进程。我们正遭受着去工业化、采掘主义、所谓的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不稳定，以及透过剥夺而引发复杂积累过程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对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有着强烈影响——所带来的折磨。

暴力是死亡的面孔，是对人权的侵犯，是数十万人的被迫消失，以及数百万移民在国内与国外的被迫流离。除了这一图像，还有因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国家削弱，伴随着由组织犯罪和权势集团所导致的坏死政治的对应物。同样地，以强化社会排斥、不宽容和歧视、男性中心的权力以及对被剥夺者和年轻人的污名化的传统习俗，不断地被重申，进而导致了社会的分裂。

我们的大陆正经历着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和文化际性 (interculturality) 的社会环境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关于自然资源及其私有化的，以及对开发与排除策略的主导权的激烈斗争。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识到社会环境保护运动 (socio-environmentalist movements) 部署来自全球南方的生态社会和跨文化战略的能力。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女性主义集体行动——透过扩大和巩固性权利及生殖权利、促使关怀社会 (society of care) 的诉求兴起、并推动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制度变革——推动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性别关系的关键变革。

自2019年以来，社会爆发 (estallidos sociales) 开启了对变革及替代性转型的新想像和期待，其影响范围与新局势是批判性社会思想应该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一个极右翼采取攻势的背景下。最近在美国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选举结果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其影响的合理担忧，特别是关于白人至上主

义、父权体制、种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带来的分裂性作用。上述趋势加剧了对移民的迫害，引发了对该地区毁灭性的经济战，强化了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力量，并破坏了国家监管和任何可能的多边行动的能力，以解决生活各个领域的严重的多重危机。

加勒比 ALAS 国际大会关注着对大大扩展了社会民主化的社会斗争成就的破坏。它反对：仇恨言论、武装冲突中对暴力的正常化（naturalization）、对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共权利的否定与蔑视、对公共抗议的刑事化，以及个人主义的极端扩张。

同时，它支持对公共教育的各种诉求，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社会学以及所有社群与祖传知识的捍卫。

我们主张一种具批判性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全球社会学能够重新激活展现出社会学想像力的历代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与反思。我们委身于乌托邦愿景并声援公民和人民的解放。

与此同时，新科学、科学革命、人工智能以及数位科技都应以非异化、不与消费主义挂钩、敏感于自然以及能够强化民主共存的方式被采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那指向和平共存以实现人民和民族的美好生活的诸多身分认同以及包容性归属感的承载者；它们的使命是激进的和平主义，反对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并在包括乌克兰以及北非和南亚人民所遭受的所有武装冲突，以正义和尊严促成和平。

面对上述提及的星球危机（planetary crisis）和不确定性，ALAS 作为在多样性中团结的学术和社会表达的关键行动者，致力于在批判性思维的框架内收集其历史遗产，以培养创造力并促进变革性社会学知识的生产，透过其实践（praxis）扩大和深化社会和认知正义的普世权利。■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ALAS）第三十四届拉丁美洲社会学大会全体大会宣言，多米尼加，圣多明各，2024 年 11 月 7 日。

